

毛泽东

哲学思想

延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88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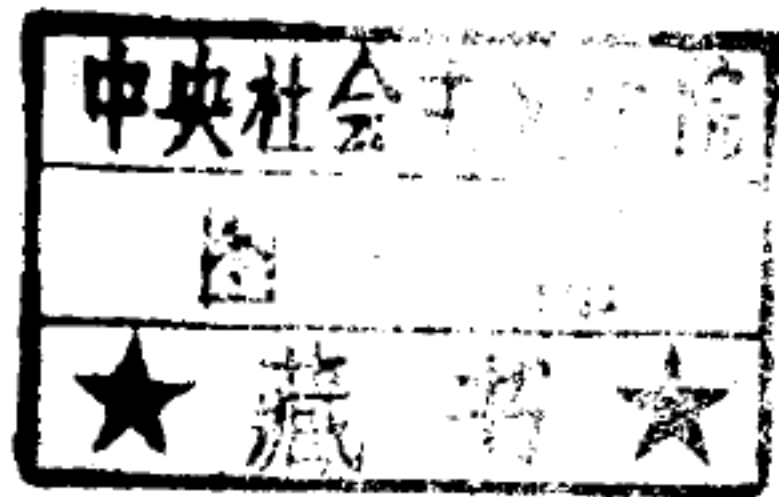
A84
60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7708/19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

曾宪新 刘金田 郑昭红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

曾宪新 刘金田 郑昭红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25印张 6插页 14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099—8/G·4389

定 价：9.0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

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提出和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

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一、延安时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成熟的时期——绪论 (1)

(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1)

(二)延安时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熟的时期 (7)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批注研究活动 (16)

(一)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准备 (16)

(二)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39)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哲学思想 (45)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

研究战争规律 (45)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 (62)

四、《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71)

(一)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72)

(二)认识的辩证过程 (82)

(三)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97)

(四)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103)

五、《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105)

(一)两种宇宙观 (106)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11)

(三)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123)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28)
(五)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35)
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论证和确立	(139)
(一)通过整风对全党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教育的必要性	(139)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论证和确立	(154)
七、从世界观到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167)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贡献	(168)
(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领导方法和 工作方法科学化、系统化达到成熟的标志	(177)
结束语	(191)

一、延安时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熟的时期——绪论

(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 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这三件大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经验,江泽民同志指出:“在 70 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经验,就是在实际斗争中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证明了这条真理。

大革命失败后,几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也相继失败了,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摆在全党面前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摸索出了创建人民军队，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完全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了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的现象，于是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就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①相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

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而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国后，我们党继续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成功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这些胜利中的一个范例。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97—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42页。

对其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过进行这种和平赎买的政策和方案的轮廓。主要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了，列宁的方案没有能够很好地实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前，是长期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夹缝中生存和挣扎过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有两面性，即革命的一面和妥协的一面。因为有革命的一面，所以在民主革命中它和无产阶级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两面性，即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和唯利是图，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因为有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出发，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即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办法来赎买，同时还创造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我们党不是采用这样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改造政策，而是采用别的办法，例如没收和排挤，就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一胜利，他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① 这是对我国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2页。

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最好的总结。

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经历过挫折和失败，而这些挫折和失败，就其思想根源来说，无一不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独秀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照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模式，提出“二次革命论”把中国资产阶级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础，国民党则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拱手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让出去，结果招致了大革命的严重失败。

王明把苏联革命的经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硬搬到中国革命中来，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建国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过程中，又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两次错误，一方面表现为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作客观的全面的调查分析，任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两次严重错误也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事业的生命线,革命和建设什么时候遵循这条思想路线进行,就胜利,就前进,反之,则失败、后退。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①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出之《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原意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毛泽东同志引用这句古语,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

从毛泽东同志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与辩证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句话说,“实事求是”的原则,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首先,“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物质第一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的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这个原理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石。离开这个基石,“实事求是”原则的其他方面,都会变成根据不足的思辨之谈。这是因为,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认识是第二性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正确的、真理性的认识,必须从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01页。

“**实事**”即客观存在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

其次，“**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规律是客观的原理。客观世界是在不断运动着、发展着，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人们只能掌握它、运用它。因此，认识事物必须认识它的规律，从“**实事**”出发还达不到认识事物的目的，只有进到“**求是**”阶段，“**求**”到了“**是**”，才算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所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局限于对事物的现象以及事变的过程作简单的描述，而是要透过“**实事**”的现象方面去系统分析事变过程的本质方面，从而制定变革现实的总策略和一般方针，进而产生具体的规划和行动方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把“**求是**”解释为“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第三，“**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从上述对“**求是**”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求是**”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的认识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的过程。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开始，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从事物的现象出发，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开始，不如此，认识就不能产生，但停留于此，正确的、真理性的认识也不能获得，因之必须向前发展，进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为此，必须作“**求**”的功夫，即研究、分析，也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这样才能“引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达到理性认识。

第四，“**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性标准的原理。上面谈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过程，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进行的，而绝不是闭门造车。这是因为，认识，无论是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都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离开实践，离开对

客观事物的变革活动,要想获得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只有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才能接触到现实的各方面现象,进入认识本质。在实践基础上“求”到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即具有真理性,也不能靠自我评说,自我夸张,也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种种局限,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求得真理性的认识,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成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甚至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最终取得。这个复杂的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

上述内容,是构成“实事求是”原则基本的、显而易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当然这远不是全部原理,但仅此也可以看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个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它只是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更加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去夺取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

(二)延安时期是党的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成熟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直到延安时期,经过整风,经过党的“七大”,这条路线才在全党确立起来。

党在幼年时期,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当然,从党成立时起,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已经着手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

问题，他们写了许多著作，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但是，不论毛泽东还是别人，当时都没有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更没有提出在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

在党内，最早提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是他在1929年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历史性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中和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提出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去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就提出了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号召人们“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1920年3月，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对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的“调查及研究”，早在他求学时代就开始了，当时他与学友以“游学”的方式到长沙附近几个县的乡村了解农村的各种情形；以开办工人夜校的方式接触和了解工人的情形。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从事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正是这种功夫，使他有可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光辉的著作。

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将来自全国各地、熟悉各地农村情况的学员作为调查对象，亲自向他们了解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从而获得丰富的能够反映全国农村情况的调查材料。毛泽东除亲自调查研究外，更主要的是指导和组织学员进行农村调查，并且成立了“农民问题研究会”，毛泽东为研究会提出了36个调查项目。对于学员的调查

成果毛泽东极为重视，除亲自修改外，还把一部分材料编进《农民问题丛刊》中出版。他在《丛刊》的序言中说，学员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

1927年初，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面对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革命和反革命，革命队伍中的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争论。为了正确答复这个问题，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进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以调查所得的事实，雄辩地驳斥了种种反革命谰言和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是一篇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也先后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善于总结经验的非凡才能，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工农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创造性的巨大成果。

上井冈山后，毛泽东为开展土地革命、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活动。先是为制订土地法，进行了不断地调查。先后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以及陂头会议对兴国《土地法》的补充等。这些土地法根据实践经验不断纠正

了不正确的部分,使之逐步完善起来。此外,毛泽东还进行了有名的寻邬调查和兴国调查等,了解了许多农村和城镇的基本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的提倡,红四军也逐渐养成做社会调查的传统,所以1929年9月,陈毅同志向中央作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红四军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工作。周恩来同志根据陈毅同志报告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九月来信》也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对调查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阐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即肃清唯心观念(后来一般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决议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这两条,前一条说的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后一条说的是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虽然还没有用这样的语言)。古田会议决议的这些论述,反映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91—92页。

党、红军及其许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经验，而又由毛泽东同志把它们集中和提高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在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由作者自己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改题时毛泽东回忆说，他“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邬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这篇文章，思想内容十分深刻。它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后来在我们党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但在当时却使人耳目一新的口号。通篇文章就是从各个方面阐明提出这个口号的理由。这个口号反对了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自己从事和倡导调查工作的实际体会的生动概括，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文中还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这一伟大真理，因此，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这篇文章初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1931年4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出一个通知。通知的末尾，有一个重要提法：

“我们的口号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6页。

② 同上，115页。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①

这是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的补充和发展，使这个口号更加完备了。从《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和总政治部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这个口号作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号，在党内反复加以宣传和阐发的。

但是，毛泽东这个口号和它所代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不单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所接受，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这个口号连同毛泽东在红军和苏区土地革命中制定的正确政策，都遭到错误的批评。这次会议的决议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这是王明路线在苏区贯彻的结果。

毛泽东后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曾经谈到历史上这场争论。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使中国革命又一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次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经验,教育全党,到达陕北后,写了一系列著作,精湛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

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合对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这是同本本主义作斗争的继续。

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军事问题,揭示了党内存在的两条军事路线的原则分歧,其实质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为人们客观地全面地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看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

《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是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问题,提到认识论上、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系统地加以解决。所以,“两论”绝不是两篇孤立的、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为在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重要著作。这两篇著作,就它们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而言,就它们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所作的透彻的哲学批判而言,就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言,就它们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它们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及在世界思想文化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中无疑应该属于最重要著作的行列。

《实践论》、《矛盾论》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还经历了一个长过程。毛泽东在“两论”

之后，又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等。它们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解决各种军事、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而成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先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且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

延安整风是以学习运动的形式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深刻、完整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此外，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整风文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文献，也都是或者从一个方面说也是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经过整风和七大，果然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确立是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说的，也是从全党各级重要领导骨干的思

想上说的，从全党形成系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作风上说的。这个确立的伟大意义明显地表现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同时也表现在这个在延安成为全党思想财富的东西，在建国后指引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历史证明，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会出现反复，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实事求是定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这就充分肯定了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崇高地位。在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基本路线过程中，党一方面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同时也反对以旧的观念禁锢思想，思想不解放的“左”的倾向。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思想不解放，受到脱离实际的东西的束缚，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不符合解放思想的要求。让我们在延安形成的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批注研究活动

(一)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准备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即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纠正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有了落脚点,环境相对安定一些,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清算教条主义。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有些人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不久,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充分说明了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作用,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时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从政治上纠正“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为了从理论上清算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准备,首先是从读书开始的。



1. 读书与批注

读书是毛泽东的终生爱好。从幼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直到1976年9月临终之时,身边还不离书。青年时代,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也常常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即使是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还是不忘读书。到了陕北以后,读书的条件相对好了一些,他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了各类书报。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各门学科的书籍,他都涉猎,尤其爱读哲学书籍。从基本原理到中外哲学思想史、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当时的延安,书籍奇缺,哲学著作就更少,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有经过长征带在身边的,有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提供的,有向周围同志借来的,也有别人赠送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他读过的一些哲学书有的上面至少有两三个笔迹不同的人写的批语。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他(指毛泽东——作者注)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了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沙、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主要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尽管当时这方面的书很缺乏,他“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曾对斯诺这样介绍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寄给其他领导同志读。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①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行军中,毛泽东丢弃了好些衣物,却坚持把马列著作译本带在身边。即使在他患病躺在担架上的时候,还读马列的书^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曾对毛泽东提出种种讥讽和责难,有人甚至给毛泽东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件事时曾这样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和有关资料,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主要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列宁:《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版的中文本)、《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关于辩证法的笔记》;

① 《彭德怀自述》。

② 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五十年》。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

还有：《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版的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等。

毛泽东自己说过，马列著作中，他较多地读了列宁的著作。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① 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书是他读得遍数最多的。

由于当时有些经典著作译本不够完善准确，有时他便把不同的译本都找来，对照起来读。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现在就保存有毛泽东读过的两种版本：一是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 1935 年 9 月再版本；另一种是笛秋、朱铁笙合译，上海明日书店，1930 年 7 月版）；

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专著主要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 1935 年 6 月第 2 版，1936 年 12 月第 4 版）；

《新哲学大纲》（米丁著，艾思奇、郑易里合译，北京国际文化书刊社 1936 年 6 月出版）；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2 月初版）；

《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上海现代书局 1930 年 8 月版）；

^① 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6 日在武汉会议上的一段插话。

《机械论批判》(史托里亚诺夫著,任白戈译,上海辛垦书店1932年7月初版);

《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著,柳若水译,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3月初版);

《黑格尔哲学入门》(甘柏石介著,沈因明译,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5月初版)。

毛泽东阅读的国内哲学家的著作主要有:《社会学大纲》(李达著,上海笔耕堂1937年5月出版);《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哲学概论》(张如心著,昆仑书店1935年10月再版);

《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严群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等等。

当然,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还远远不止这些。

1936年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他在《西行漫记》中曾报道了毛泽东读哲学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86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有几封信就反映了毛泽东在延安读书的情景。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易礼容的信中说:“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李鹤鸣,即李达,信中提到的李的译著,很可能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需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外面”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元至300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11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虽然这后两封信不是直接讲毛泽东本人读书的，但从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读书、尤其是读哲学书的重视。

毛泽东读书十分认真，有的经典著作，他不止一遍地读，而是几遍、十几遍。有时他每读一遍就在书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圈，不少现在保存下来的他读过的书，封面上都有这种引人注目的记号，有的是4个圈，有的是5个圈。据他自己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读了10遍以上，《联共党史》也读了10遍。

“不动笔墨不看书”，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一些重要书籍，书上总是留下不少记号，圈圈点点，有些加了不少的批注。翻开他批注过的书，常见的符号有：△、○、—、×、√、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号和问号。这些符号都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时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尤其是问号，毛泽东在所有批注的书里用得较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这就说明毛泽东对此处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有些

地方毛泽东先画上问号后又画去,表明他后来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他的文字批注,则直接反映出他的见地和思想。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注的哲学书籍,有下列几本。

(1)《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

毛泽东读到这本书的最早时间,可能是在1936年8月14日前。这可以从毛泽东1936年8月14日给易礼容的信中看出。从书中批注的内容、笔迹的先后以及毛泽东本人在书后的批读时间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可能批注了四遍。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末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 11”,可能是指第一次批注的时间;第二行是“1937. 4. 4”,则是第四次批读完毕的时间。

毛泽东阅读这本书,先后写下了12000字的批语,其中有简单的赞同语、评论性的文字,如“对”、“此例很好”、“不甚清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也有章、段的提要、概述;还有理论性的发挥,就一些哲学原理和观点对该书的引申和批判;有结合中国实际联系中外历史、对抗日战争进行分析对比的思考、有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和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尤其以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的批注文字最多,达到9000多字。

郭化若曾以亲身经历这样描述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天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

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①

(2)《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没有留下准确的时间,从批注的内容上判断,可能是在1941年3月以后,因为批注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而三月参政会是在1941年3月1日至10日召开的。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重点是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伦理学”,全书的批注文字约1200字,这一章就有870字。对这本书的批注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中国主观主义”的批注文字特别多,达到20多处,联系到此后不久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不难看出毛泽东批读这本书的重要性了。

对这本书的批注可能是毛泽东延安时期读书批注中较晚的一次了。从1936年冬毛泽东第一次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到1941年夏秋,经历了5年时间,期间,毛泽东还批读了其它几本重要的哲学书。

(3)、《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这本米丁主编的书的中译本出版于1936年12月。毛泽东批读这本书没有留下准确时间,但从批注内容上分析,当在1937年8月以前。因为从毛泽东批注的2600多字内容看,主要集中在第3章第5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4章第1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2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内,也就是说重点仍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其中有些话与《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只是批注的观点在“两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这些批注为“两论”奠定了基础。而“两论”的完成是在“1937年7、8月间”。

^①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

(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这是河上肇著,李达等人翻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11月第2版)。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不多。

(5)、《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由博古翻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12月初出版)。该书出版后,博古赠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批读这本书的时间,应在此之后不久。这本书共有52页,毛泽东几乎在每页上都画有批注符号,还写有200多字的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文字。

(6)《社会学大纲》。

李达著的这本书,初版于1937年5月。该书出版后,李达即给毛泽东寄去,请其指正。毛泽东曾阅读了十多遍,并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还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这个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关于这本书的批读时间,毛泽东在他的《读书日记》上有详细的记载。《读书日记》是1938年2月1日开始写的。开头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日记中看,毛泽东1938年1月17日开始至1月31日看完了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3月16日全部看完,其中“没有看书”有24天,总共花了一个多月,最多的一天读了47页。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画密密麻麻,各种符号都有。据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工作的王子野回忆说:“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画线最多,批得最详细,至今记忆犹新”。^①毛泽东批注的重

^① 王子野:《学习毛主席认真读书不耻下问的精神》。

点集中在第一篇“唯物辩证法”部分，批注的文字也主要在这篇里。从批画的笔迹看，有相当多的部分，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全书批注文字约为 3400 字。

(7).《思想方法论》。

艾思奇的这部著作出版于 1937 年 1 月，毛泽东阅读时写有约 40 字的批注。

(8).《哲学选辑》

艾思奇编著，延安解放社 1939 年 5 月出版。该书出版后，毛泽东至少批读了 3 遍，第 1 遍是用黑铅笔批画的，第 2 遍是用毛笔批注的。第 3 遍是用红蓝铅笔批画的。全书 500 页，几乎每页都有黑铅笔批画符号。批注主要集中在“绪论”第 2 节“哲学是党性的科学”和第 1 章第 1 节“哲学中的两条路线”、第 2 节“机械唯物论”以及第 3 节“主观唯心论、马赫主义和直观主义”部分。

毛泽东对《哲学选辑》中的“研究提纲”文字批注较多，对其中的某些哲学观点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如艾著中讲道：“抗日的党派是进步的党派，凡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里的阶级党派，都是进步的”。毛泽东则批注道：“都是进步的，但是有差别的。抗日阵营以内有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彻底的，一条是不彻底的。哲学路线也一样，前者对后者必须批评克服之。”又如艾著中提到，旧唯物论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三大特点：机械性、形而上学和历史观上的不彻底性。毛泽东批注说：“只有两大特点”。他认为机械性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性的一种表现，应归并到形而上学性中去。

毛泽东阅读这本书，写下的批注文字有 3200 字之多。

上面列出的 8 本书，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批注的哲学书。这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其它书上是否还有批注，根据笔者推断，应该是有的，只是迄今仍未发现。也许

有些他阅读批注过的书,后来在辗转阅读中丢失了。希望以后能有新的发现,这是题外话。

以上列的8本书,有实质内容批注的主要是在5本书上,共有两万多字。综合起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纯哲学基本理论的批注。

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这也是全部批注的核心和主体。

在认识论部分,主要涉及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和阶段、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实践观等问题。

例如,毛泽东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时写道:“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从直观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面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想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变,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两个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这些批注的观点,后来都写进了《实践论》中去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认为:“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对此话批注道:“还有,由思维到物质”。李达还有一段话说:“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

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转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此又写了一段批语，指出：“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两条批语，是对李达书中观点的重要补充，也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的重要补充。这是《实践论》观点的继续。

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批注较多的有：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内因与外因、可能性与现实性、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等基本范畴。其中尤以关于对立统一法则的批注为首要，单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有关批注就达6000多字。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毛泽东后来都写进了《矛盾论》中去了。但他在批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时，十分重视李达的观点。李文中写道：“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括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因为在对立的统一发展过程中，所谓‘飞跃’、‘连续性的中断’、‘向反对物的转变’、‘质量间的转变’、‘旧物死灭与新物发生’都是必然的形态，都是对立的斗争的发展，都是由对立的转变而显现，都是由对立的统一去说明。”这一观点，虽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没能阐明，但毛泽东是表示赞同的。而且后来，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二是联系中国实际的批注。

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联系中国的实际写了大量的批注。

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中关于“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一节里批注道：“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

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他在《论持久战》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分析和对比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强弱程度,优劣形势随战争过程延长发生的变化,作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在同一本书中,毛泽东还批注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

毛泽东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唯物辩证法与形式伦理学”这一章时,联系中国实际,写了许多批评“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的话,说他们的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他们也带有形式主义性质,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他们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等等。

毛泽东的批注,从形式上看,既有对原文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以及发挥;又有对原文观点的疑问;还有自己提出的独立见解。

我们从毛泽东在不同书上对同一哲学观点的批注来看,他的有些观点是发展变化的。如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的批注中写道:“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在《哲学选辑》的批注中,他却说:“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

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的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这一批注说明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状态下，矛盾的统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一批注是对《矛盾论》的重要补充。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这一哲学问题的说明逐步发展，而且更加全面和辩证了。

2. 研究和探讨

毛泽东在阅读和批注哲学的同时，又进一步开展对哲学的研究和探讨。

讲授哲学是他研究和探讨哲学的一项重要活动。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通篇贯穿着军事辩证法则和人民战争的观点，贯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指导战争，提出战争是有规律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自己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研究战争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的观点；把握全局与照顾局部的观点；在客观条件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指导能力的观点；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观点等等。这篇讲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高度概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制定了一整套研究革命战争和指导革命战争的理论 and 政策。它既是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关于这篇讲演的哲学思

想,本书另有专门章节着重介绍,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毛泽东的这篇讲演稿,是毛泽东研究和探讨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为了讲授哲学,毛泽东作了认真的、充分的准备。毛泽东自己学了哲学就给大家讲,他把讲课前的准备和讲课时的讲解,作为加深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郭化若回忆毛泽东讲授哲学的情景说:“他把讲课看作是学习的一种方法,认为讲课可以加深学习和记忆,讲一次课比看几回书都更能记得清楚。”^①

说到讲授哲学,毛泽东自己也曾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那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②

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讲授哲学的活动较多。最为突出的是1937年初夏他给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一、二期学员讲授哲学。当时讲授的总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为了取得教学相长的好的效果,在讲课之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们看,让大家提问题,然后再讲解。当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派人做了记录,作为历史文件保存下来。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这一提纲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重要成果。

现在保存下来的提纲记录稿共分3章16节,具体纲目如下:

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① 郭化若:《毛泽东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

②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第二章：辩证唯物论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辩证唯物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第三章：唯物辩证法

一、矛盾统一法则

但据当时是抗大二期九队学员的李唯一回忆，这个提纲在“矛盾统一法则”后面还有“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和“唯物辩证法的若干范畴”三个部分，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于1937年8月下旬去洛川开会，从而中断了哲学讲授。

毛泽东对这一提纲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中国许多辩证法书盖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望而生畏。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会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

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① 因为毛泽东对提纲并不满意,所以后来一直未能正式发表。但是在提纲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毛泽东几经修改同意发表了。

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并参加新哲学会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探讨哲学问题。

1938年9月30日,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张如心、吴理屏(即吴黎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王思华、徐懋庸、郭化若等18人,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53期上,联名向社会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指出:目前“在哲学上、在理论上,我们更缺少较专门化的东西,这是抗战以来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新哲学会的发起,就是想从目前做得很不够的理论工作进一步。我们反对脱离实践的人贫乏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相反的,正是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一个有力量的理论不是单单靠着眼前的狭隘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有着比较专门化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新哲学会愿在这样的目标之下来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做一个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团结的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来共同合作。因为哲学只是最一般的方法论上的基础,只是各科学及一切实践经验的综合,所以我们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

^①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究哲学,而且也要在哲学或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

所谓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它区别于一切以往的旧哲学。新哲学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团体,它的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帮助干部学习研究,并引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使新哲学更加广泛地传播和普及,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迅速地解决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这也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

几乎是与新哲学会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从1938年9月29日开始至11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是党的“六大”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的问题很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强调“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要求人们不应把马、恩、列、斯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不应当只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申“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号召,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①

六中全会以来，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高级干部都注意学理论、学哲学，掀起了一个高潮。

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1939年1月17日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同年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有6人参加的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培源、杨超、陈伯达。

我们从这个小组的人员组成来看，这5位都是对哲学有一定的研究的。尤其是艾思奇，当时虽然才30岁左右，但在哲学领域已有一定的影响。他撰写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毛泽东在这个学习小组中，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参加学术讨论，从而使自己的哲学研究不断深入。

在小组的学习过程中，毛泽东从不以势压人，有不同观点总是虚心地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这也是毛泽东历来的学习方法。

艾思奇是1937年9月下旬到延安的。这一年艾思奇撰写的《哲学与生活》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毛泽东即阅读了这本书，并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暇，我来看你。”

1937年9月，毛泽东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这一

^①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

摘录手稿 1980 年正式发表有 19 页之多。毛泽东还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有些地方清楚地写明“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摘录的都是一些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如相对与绝对、运动与静止、分析与综合、具体和抽象、归纳和演绎、内因和外因、量变和质变、一般和特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等。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的疑点,是指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摘录中对艾著中一个论点的质疑。艾思奇的论点是:“差别的東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東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这个论点后,写了下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艾的观点,而是提出来和艾共同探讨,并且主动相约登门听取艾的意见。

1938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随信寄去在他身边工作的医生瞿宪文和当时担任军事编辑部主任的郭化若两同志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请艾思奇一阅。当天晚上,他又给艾思奇写信说,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这两封信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虚心与严谨的学风。

曾经是毛泽东组织的6人哲学小组成员的杨超,在回忆他们当时的学习情况时说:“1939年春,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6人哲学小组,每周举行一次讨论。讨论后被留在毛泽东同志家中吃饭。讨论采取漫谈方式,哲学问题主要围绕‘两论’进行,对《矛盾论》谈得更多些,讨论不拘形式,敞开思想,自由漫谈,各抒己见。我记得在《矛盾论》的初稿中,有‘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矛盾阶段’这样一个小标题,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如果有主要矛盾阶段的话,是否还应有非主要矛盾阶段呢?如果有,又怎样解释?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后来在定稿中‘主要矛盾阶段’的提法就没有再用。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和谦虚。讨论还涉及到矛盾的发展、主要矛盾、矛盾诸方面、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以及实事求是等等,总之,有关‘两论’的重大问题、指导思想都涉及到了。当时,何培源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也是6人哲学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搞了讨论纪要没有,不得而知,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同志后来修改‘两论’时,都把大家讨论的意见概括进去了。”^①

毛泽东在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不断修改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吴黎平回忆说:“他的‘两论’油印本,就曾亲自签送给艾思奇和我等有关同志,希望阅后提出修改意见。思奇和我提出的一些意见,毛主席大都采纳了。毛主席送我的一份油印本,至今我还珍藏着。”^②

毛泽东除了自己研究哲学外,还组织干部学习研究。他首先把中央秘书处的秘书和干事组织起来学习,每星期开一次讨论会,亲

① 杨超:《论诸矛盾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

② 吴黎平:《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

自主持。参加者畅所欲言,谈的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知识,并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每次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中这样写道:“一段时间,在杨家岭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每到星期三夜晚,总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这个会是毛主席组织的,每次他都亲自主持,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首先发言,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开始谈的几个人都是毛主席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谈的只是哲学的一般常识。这个活动,后来被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也自愿地参加座谈讨论,由于人数增多,又移址于兰家坪中组部的大窑洞。这一活动激起了人们学习研究哲学的浓厚兴趣。”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整个延安学哲学蔚然成风。各机关纷纷成立哲学研究小组。他们经常举行新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开展新哲学的学习研究活动。

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哲学小组成员之一的温济泽,1981年10月在桂林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谈及当时学哲学的情形时说:“小组每星期开会一次,艾思奇同志是组长,我是秘书,每逢星期六开会,朱德、张闻天、罗迈(即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肖劲光、莫文骅等同志都参加了,学习时间大概是一年半”。

1939年2月新哲学的学习研究被列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

1940年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天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

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汇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①第二天,毛泽东在西北饭馆摆了几桌酒菜,费用是用他的稿费交付的,人们都满面笑容而来。毛泽东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年会的成功,并宣布新哲学会的成立,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毛泽东还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并和每个人碰杯,大家都受到极大鼓舞。

按照新哲学会年会的规定,每周开会一次,由会员演讲研究论文,会期拟定三个月。后来,毛泽东多次到会听讲。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在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从毛泽东自己学哲学、研究哲学,到全党学哲学、学理论,促进了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一方面纠正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的偏向,一方面也强调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学习和研究理论的重要性。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

^① 《哲学研究》1981年第3期。

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布尔什维克化12条时也指出:我们要注意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至《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发愤读书和全党重视理论的学习,为我们党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从哲学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还比较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都了解不多,经验不足,加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终于导致了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论文,初步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原理,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即区分敌我等重大问题,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看作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表现。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了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新鲜经

验,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初步的哲学总结。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被“左”倾教条主义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后,在江西寻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了一篇哲学专著,当时叫作《调查工作》。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党应该遵循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著名论断,精辟而又深刻地表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批评了那种“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教条主义思想。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总结了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的主要方法,是“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而且这种调查要明确目的、讲究技术。这些问题都带有根本性的哲学意义。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总结;是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哲学论证;是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是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论的概括。

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篇哲学短文,但是它所包含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它阐述的哲学思想,为在此后我们党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开展同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虽然它比起毛泽东后来的一些哲学专著来还显得不那么充实、不那么完满,但这是毛泽东运用哲学思想总结中国革命的新开篇。

毛泽东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发愤阅读马列主义著作,阅

读哲学著作,积极开展理论研究活动。他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了右的、特别是“左”的机会主义,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写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论文,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且走向了成熟。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它从哲学高度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许多基本经验,阐述了很多重要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强调应当“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指出,所谓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具体说在战争中,“就是指挥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首先是从客观外界获得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在实践中使理性认识得到检验和发展,这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毛泽东还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观点。指出一切军事理论都是从总结战争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指挥员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才能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初出茅庐和纸上谈兵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所有这些,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同时也为《实践论》的写作作了理论上的必要准备。

到了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更广阔的领域,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而且把问题提到认识论上,提到思想

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了理论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两论”虽非军事著作,但仍多处以军事斗争的经验为依据来阐述哲学原理。如《实践论》讲到基于实践而产生的认识深化运动时,举指挥员对战争的认识过程为例。战争指挥员在初指挥战争时,对战争规律是不了解的。打了一些仗之后,积累了打胜仗和打败仗的经验教训,经过思考,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懂得了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战术。《矛盾论》在讲到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时,指出:“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时指出:“战争中的攻守,进退,成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在讲到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指出“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1927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两论”继续从哲学上概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

《实践论》中深刻地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一科学结论是毛泽东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是《反对本本主义》中关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根源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和概括。

《实践论》中关于认识过程的论述,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概括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

诀”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李达在《〈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中说：“《实践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并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做了系统的严格的分析和独立的光辉的补充，所以说《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矛盾论》中的哲学观点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原理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这种发挥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斗争直接相关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偏偏无视这种特殊性，不了解研究这种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特别着重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统一的科学原理。这样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作出了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

李达说，毛泽东“用亲身领导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了并发挥了对立统一法则学说”，“《矛盾论》，如同《实践论》一样，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

一位日本学者在1952年也撰文评说道：“今天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毛泽东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专心思索而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也大大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理论正确并包含有新的内容，而且在于它集中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因此，不仅对某些所谓的专家，而且对一切推动历史前进而奋斗的人来说，它成了他们工作与经历需要经常掌握的指针。毛泽东吸收理论的源泉，首先是广大人民为本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的经历。”^①

继“两论”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写作了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科学著作，从多方面展开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其中军事著作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这些著作通篇贯穿了军事辩证法的思想。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论文，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一贯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原则，为我们党制订并总结了一整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突出地反映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这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走向成熟。

^① 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日本《思想》杂志 1952 年，10，12 月号。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的哲学思想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 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规律

规律是事物内在矛盾诸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它是在和它以外的事物的关联中表现出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掌握它,才能因势利导,促成事物的转化和发展。事物是运动的,所以,任何事物的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战争规律也是如此。

毛泽东指出:“不论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 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战争规律是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的内在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系和发展总趋势,是贯穿于战争全过程的东西。因此,要指导战争,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争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研究和把握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何研究战争规律?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归根到底,就是以怎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1936年12月,毛泽东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际上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

1. 毛泽东认为,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所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就是要捕捉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从事物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把握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具体规律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战争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一般规律是古今中外无数的战争实践中带有共性的东西,是从千差万别的战争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例如攻、防、进、退等理论原则。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都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要重视它,研究它,学习它。毛泽东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①但是,有了对一般规律的了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还不等于认识和掌握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因为一般规律不能代替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的特殊规律是由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和自然条件等决定的。是根据战争的特点和条件得出来的一种带有强烈的个性的东西。列宁说过：“对立面（个别和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① 战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般只是特殊的本质的一部分，它不能完全包括特殊，而特殊中却包含着一般。个性的不断发展变化引起共性的发展变化，特殊战争的特殊规律充实和发展了一般战争的规律。战争的共性和个性同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战争规律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作为战争的指导者，不但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具体的战争实际，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这就是毛泽东所要求的，“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② 这是因为特殊的革命战争，虽然和一切所有的其他战争有着共同的地方，但它必然又有区别于其他一切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即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③ 战争指导者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在运用战争的一般规律指导战争时，总是在不同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下进行的，必须从特殊战争的实际出发去指导战争。只有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地域的各自特点的发展变化去分析、研究，才能掌握战争规律，才能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样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这种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思想，毛泽东后来在《矛盾论》中作了更为充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① 毛泽东要求人们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性质的方法去解决。

在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种“机械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认为只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就行了，不必去研究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只要搬用过去某次战争的成功经验就行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都说明，他们不懂得战争的规律都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使是自己成功的经验,也要随着客观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这些特点是一般的战争规律所不能完全包括的,从战争的一般规律是不变的,可以照搬照套的观点出发,拒绝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拒绝承认必须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去制定中国革命特殊的战略战术,或是削足适履地套用中国反动政府的军事条例,或是搬用苏联内战时期的战争经验,或是照搬北伐战争时期长驱直入夺取大城市的经验,而不顾战争的具体实际,去指导战争,结果使中国革命战争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出:“从时间的条件来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①

毛泽东在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搬用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反对红军没有固定作战、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时指出,他们贸然地脱离现阶段,“装作一个大国的统治者办事,反对流动性,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② 他还指出,阵地战、相对固定的作战线是一般战争所采用的方针,对于十年内战中的红军来说是“基本上无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①因而，毛泽东强调：“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②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每次战役形势的不同，同样的战略规律表现形式也就不同，在战争指导上也就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根据情况，活用原则。例如，同样是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但退却的终点、反攻的时机等等，都要根据敌我双方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由于革命战争的规律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发展，进而，毛泽东要求我们的战略战术也要“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③

认识战争规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战争这种社会现象，比起其他事物来带有更大的流动性、不确实性和偶然性。但是，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它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固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它又是历史的，是发展变化的。由于规律是现象中那些具有重复性、稳定性的东西，这就使那些具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很容易把它的稳定性、重复性视为绝对不变、超历史的。其实任何规律的稳定性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的不变性是相对的，变动性是绝对的。所以，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④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同一战争的不同阶段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③ 同上，第18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由于红军的力量十分弱小等原因,红军只能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16字诀。而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和根据地都扩大了,毛泽东及时地把游击战发展到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占地甚广却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又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即“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①

2. 毛泽东认为,任何一级指挥员要把握战争规律,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

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全局和局部的问题。毛泽东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②战争的全局,指的是战争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它是有关战争所涉及的一切,包括了精神、物质诸因素。就事物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全局有大、有小。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除了这种战略上的全局以外,战斗、战役也有自己的全局。但是,这里所指的则是小全局,它往往不是独立存在和孤立进行的,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牵连较大,是在大局的意图下进行局部性质的东西。因此,这种小全局只能说是较小范围内事物的整体,它并不具有战争全局所指的那类性质。所以,必须首先注意把战争的全局和战役、战斗的“小全局”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全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它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但全局并不是各个局部的简单相加,它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全局统率局部,对局部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① 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就是战略和战役、战术之间的关系。在战争中,战役或战斗的部署必须服从于整个战略的部署。只有在正确战略原则指导下的战役和战斗的不断胜利,才能促使战争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才能根本改变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形势,使整个战争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强调“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② 战争的实践证明,战争的胜败,往往决定于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是否正确,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首先的问题,是对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好或关照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③ 因此,毛泽东要求指挥员要懂得战略,作战指挥要考虑各个方面,不能盲目乱干,不但要考虑左邻右舍;还要考虑到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在打第一仗前,就要考虑到打第二仗、第三、第四乃至最后一仗怎样打等等,打胜了,战局将起什么变化;打败了,局势又将要变得如何? 只有懂得全局,胸怀全局,从全局出发去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取得战争的胜利。胸无全局,则目光短浅,最终必然要导致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都不乏其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② 同上,第17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75页。

毛泽东不仅要求指挥全局的人,要注意照顾全局,同时也要求指挥局部的人,也就是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要懂得全局,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会更好地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才会深刻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局统一的作战意图下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为全局服务。比如说,作战指挥员,只有懂得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不会期望在哪一个战役就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只会积若干次战役战斗的小胜为一次战略上的大胜,才有可能防止革命的急性病。

局部是全局的一部分,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它隶属于全局,必须服从全局。在战争中,战役或战斗都是隶属于整个战略的各个局部,它所能解决的只是同整个战略有关的局部问题,如果局部的部署同整个战争的战略部署发生冲突时,则应服从于大的战略部署。但局部对全局时时刻刻都产生着自己的影响。由于事物矛盾的不平衡性,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局部无论如何,对全局都不起什么重要影响,也就是说无关大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①但在一定条件下,当某个局部成为影响全局的主要一环时,它对全局就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也说到:“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举例来说,1930年底至1933年在江西龙冈,富田、兴国、宜黄南部的几次胜仗,就决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几仗,都是对全局起着重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影响的，它们的胜利，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的有利的战略态势。再比如，1934年在硝石、资溪两地红军的败仗，则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引起了一个严重的战略变化，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才摆脱了险遭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总结道：“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的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是所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

毛泽东要求指挥局部的人，从全局出发，必须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问题，并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提高到较高的原则上去解决。有些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作战方案，在全局看却是不可行的，要么就应该坚决的服从全局，予以放弃，哪怕因此放过了在局部范围内歼敌取胜的机会，也不足惜，因为这种局部范围的小胜对全局可能不起任何决定作用，有的甚至因此而妨碍了全局战略的实施，以至导致大的失败，造成顾小失大的后果。有些在局部看来是不可行的作战方案，但由于全局的需要，也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全局，乃至牺牲局部，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因为这时的局部对全局的成败起着决定的作用。用局部的失败来换取全局的胜利，也是值得的和必须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丢卒保车”。

毛泽东要求指挥员关心局部，强调对带有全局意义的局部要特殊加以关注，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对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不应当放在次要的问题或动作上，注意掌握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寻找对战争全局的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作为重点、关键。抓住战争中最关紧要的战役，甚

至重大的战斗。因为这些战役、战斗是有关全局的枢纽。“一着不慎”则可能造成“满盘皆输”。当然,这种“重要的关节”不是任意可以抓到的,而是在认识战争全局规律的基础上用心研究才能抓到。毛泽东说:“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重要的关节”是什么,没有既定不变的,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来确定。比如,在选择突击方向时,当确定的主攻方向进展缓慢,而助攻方向进展顺利时,就应把攻击主力转移到助攻方向。这样原来的主攻方向则变为次要方面,而助攻方向则成为主要方面了。这就给每个指挥员提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要求。

全局和局部的界限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于事物范围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之,在一定场合为局部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全局。所以,毛泽东要求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必须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认识和把握全局,照顾全局和服从全局。

当然,要求每一个指挥员都能自觉地照顾全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除了战争形态的复杂性等因素之外,还有人的主观上的局限性。指挥员认识的角度和高度的局限,和对暂时利益、区域利益与长远利益、广大利益的考虑,都会直接影响到能否做到照顾全局和服从全局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的任务。

毛泽东在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正确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的同时,批评了那些只见局部不见全局,或只见全局不见局部的片面性错误,特别是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主张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一味企求战役、战斗的胜利来代替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只看见“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看见“丧失土地”等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便反对战略退却,在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出击”。他们的眼睛看见的是局部、暂时的现象,却以偏概全,提出全局性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批评说:“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抓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

毛泽东说:“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有指挥局部战争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毛泽东阐明全局和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是要求任何一级的战争指挥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把握全局,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之间和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要求指挥全局的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研究战略学,而且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要“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这样,从上到下都能更加自觉地掌握战争规律,取得战争的胜利。

3. 毛泽东认为, 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 必须解决好主客观的矛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

主体。”战争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沿着它自己的规律在运动和发展着的。而战争指导规律则是战争规律的反映，它是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所以，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就必须认识客观存在的客观规律，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不断变动的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分析战争中打败仗的原因时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好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怎样才能使主观与客观很好地符合起来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样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里首先要做到的是全面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先决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军事指挥员就不可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也就不可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说：“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掌握材料必须做到全面、周密，片面性是不行的。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和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就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就在于你掌握材料的工作是否做得好。要

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就得搞好调查研究,只有通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占有的大量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具体分析,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军事上说,这种调查研究,乃是正确判断形势,正确决定战略方针,正确部署战役或战斗的客观依据。毛泽东指出:“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实际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种调查研究愈深入对情况的判断就愈明,决心就愈大,作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就越稳妥可靠。军事计划制定得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如果实践证明计划不符合于实际,就必须及时地改变原定计划。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两个认识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

要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毛泽东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善于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直接参加战争的实践,才能获得对战争的真知。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轻视革命实践的错误观点,指出“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

分。战争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别人在实践中概括形成的知识，是一种间接经验，毛泽东认为，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的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是用鲜血换来的，应该着重学习它。然而，学习不应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应该“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毛泽东本人也十分重视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他从不是照抄、照搬，而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认为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在认识和处理战争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战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里，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它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

客观物质条件对战争的胜负起主要的决定作用。重视客观物质条件，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基本前提。客观条件是人们赖以活动的舞台。人们不可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虽然，战争活动是

由武装着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进行的，表面上看，作战双方都可以按其主观愿望任意支配自己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他们的思想行动，归根到底，是要受进行战争的客观条件的制约。诚然，条件具有可变性，甚至可以被创造，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改造和改变条件，也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作用。不论是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干什么，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决不是说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可以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可以脱离客观物质条件构造的舞台而横冲瞎撞胡来蛮干。否认这一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违背客观规律，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了所谓的“新的军事原则”，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什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土地”等等。毛泽东批评说：“这全部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这是鲁莽家们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上去似乎是很重视“主观能动性”，实际上，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只能是主观主义的“高度发挥”和恶性膨胀。

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它对战争的胜负也能起决定的作用。必须看到，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客观条件的有利与不利只提供战争胜负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负的现实性，并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即要在战争中获胜，还有待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否认这一点，把客观物质条件的作用绝对化，抹煞了意识的反作

用,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毛泽东在文章中援引了中国战争史上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说明只要遵循战争规律,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指导能力,就可能变劣势为优势,取得胜利。

主观指导能力的高低,决定于是否认识战争规律,并根据客观规律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才能在实践中把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统一起来。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的统一,都是决定战争胜负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物离开了人,对战争毫无作为;人离开了物,也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愈深刻就愈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愈是高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愈能更深刻地认识客观规律。当然,在战争中,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不可能样样俱全,只能力求在主要方面条件具备了,就可以大胆放手去干,然后再从实践中发展原来的条件,创造新的必需的条件,改变不利条件。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中的主观性、灵活性、计划性是就要靠人的主观努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如何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更需要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和竭尽主观之努力。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处于战略上的内线作战,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的恶劣环境之中,蒙受着许多的不利。毛泽东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分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

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都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一次明确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是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从客观物质条件来说,我军大都是处在劣势的情况下同强大的敌人作战。然而由于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高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

1. 具体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毛泽东运用认识论和辩证法,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的原理,综合地考察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发展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客观情况,概括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个主要特点,从而找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重要性,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①毛泽东在文中援引了列宁的这段话,批评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而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的错误,指出:他们“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从而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毛泽东说,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制定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运用这一方法,不仅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四个主要特点,而且阐述了这些特点对中国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从政治上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大小军阀的割据,城市反动势力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较强，农村反动统治相对薄弱；从经济上来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存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而且又有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力量不仅有立足之地，并且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这就说明了中国革命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这种不平衡，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战术，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战术。

红军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它不仅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政权，而且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还得到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有着数量庞大、装备和世界国家大体相同的常备军，而红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与之相差甚远。这就使得红军和敌人作战时，其战略战术不能同一般战争、苏联内战以及1926年的北伐战争相同，而必须采取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战法。

红军的情况是数量少、装备差，物质供应非常困难，已有的政权是分散的、孤立的，没有任何外间援助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经济文化落后，而且流动不定，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这一特点决定红军只能采取游击战的战术。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略方针。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创造红军。“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有农民的援助，红军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战斗的，官兵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而国民党则相反，他们反对土地革命，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统治区域虽大，但人民要起来革命，则相对不稳定，军队数量虽多，但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

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从而找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他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

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红军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阐述了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相互联系,同时存在的辩证关系,从而得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这个规律已被10年内战的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2. 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其一定的运动形式。这是区别各类不同事物的标志。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这里所说的“长期的反复”,是指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就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

“围剿”和反“围剿”作为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必然表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了红军在较长时期内总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之下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国民党军队总是把红军当成“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总是对红军实行“围剿”。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总是竭尽全力来打破“围剿”,始终采取的是反“围剿”的形式。这一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已为红军10年的战史所证明。“10年的红军战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但是，毛泽东强调，“围剿”和反“围剿”的这种反复，则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每次不同，并进一步揭示其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主要形式一直到红军变得强大，国民党军队变得弱小，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发生变化的那一天为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一些人在中国内战形式问题上，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不承认敌我力量对比较其悬殊这一客观事实。因而强令红军占领中心城市，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以便在短期内结束中国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革命的迅速胜利。1930年的“立三路线”和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都是在认识中国内战形式问题上犯了错误，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因此，毛泽东认为，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对于战争的指导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3. 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在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及其特殊规律之后，提出和论证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集中地体现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的基本形式，它构成了战争的总体。陈毅同志曾这样说过：“一般军事家对进攻问题永远只是进攻问题，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对防御问题，永远只是防御问题，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而进攻和防御这两个战争的基本方式，在毛泽东

同志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和新的角度。”^① 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这里,毛泽东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术上的进攻紧密地结合起来,寓进攻于防御之中,并赋予防御这种消极形式以积极的内容。

毛泽东指出:“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② 进攻和防御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其对立主要表现在强弱方面的对立,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以及它们在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但是,这种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们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

说进攻和防御相互依存,是因为它们二者之间互为存在的前提,没有进攻,就无所谓防御;没有防御,也同样无所谓进攻。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也是保存自己、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攻中有防,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防要转入攻,攻和防在不同层次上又会相互渗透。在战略进攻中,包含着战役和战术的防御;在战略防御中,包含着战役和战术的进攻。也就是说,在战略的层次下,战争的每一方,进攻和防御可以在不同方向同时存在。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结合起来,就是防御和进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的表现。由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进攻,这又是防御和进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表现。

在对待进攻和防御的关系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辩证法和

① 1978年9月7日《解放军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毛泽东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原则分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把进攻和防御机械地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有进攻便不能防御，有防御便不能进攻。根本不懂得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因而他们有时一味只讲进攻，一概否认防御和退却，搞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时而只讲防御，根本否认进攻的可能，搞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结果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是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的防御。它要求实行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防御中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

诱敌深入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生动地体现了得和失的辩证法。诱敌深入又称战略退却。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这种有计划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动的，但在实际上却是积极主动的，这就是战争中以退为进的辩证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红军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剿”，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即诱敌深入的方针，目的就是保存自己，待机破敌。结果取得了胜利。这种战略退却就是一种积极防御。但是，实行诱敌深入，必须处理好“得”和“失”的关系，必须暂时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只有这种暂时的失去，才能长久的得到。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

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的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也就是毛泽东所阐述的“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的辩证法思想。

当然，必须注意到诱敌深入只是弱军在强敌进攻面前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并不是一个必须有的战略阶段，要不要实施战略退却，应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可以促使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化。

以弱胜强，由弱变强，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质量互变规律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从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既承认优势和劣势是具体的、物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同时又认为这种东西不是凝固的，不变的，而是运动的，可变的。具体来说，当我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时，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能够求得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争取每战的胜利，形成部分质变。通过部分质变，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然后经过战略攻防的多次反复，通过许多小的积累和许多部分的质变，逐渐使红军从弱小向强大方面转化，一直到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这时，战略上的防御就开始转变为战略进攻，以实行根本的质变，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争取胜利所依靠的重要一着。弱军对强军，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好处是能以一当十，拖住敌人，在长期战争中发展自己，削弱敌人。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可以使

自己在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使自己由弱者成为强者,变强敌为弱军,这就要集中优势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每次战役、战斗中,我军总的数量虽少,但可以集中兵力攻敌之一部,使我方的力量占有绝对的优势,才能确有把握地消灭敌人。这是使我军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军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到写《矛盾论》时,就发展成为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也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敌人的兵力都是数倍乃至十多倍于我军,从战略上说,我们确实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但是,在每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都是集中兵力,造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很快地歼灭敌人的一路,再转移兵力各个歼灭其他敌人,最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比如,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敌人的兵力有20万人,而我军只有3万人。我军集中兵力攻敌一路,先将敌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包围,经一昼夜激战,大部歼灭敌人,并乘胜逐个攻打敌43师、25师、81师和56师,15天中行军700里,5战皆捷,缴枪2万余枝,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也广为应用,并成为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四、《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一向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读书和研究哲学的,延安时期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曾先后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从1931年到1934年期间,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和严重的挫折。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都具有其哲学上的思想根源。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进一步系统地从哲学上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并教育全党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1937年7、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也是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为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这两部哲学著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哲学的遗产,吸取了当时国内外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积极成果,运用广大群众所熟悉的语言,深

深入浅出地、系统地论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成熟的主要哲学代表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形态,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贡献。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所讲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第2章第11节,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这部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错误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它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

(一)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 实践的形式和特点

毛泽东首先阐明了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见《实践论》,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实践论》)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是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人类要生活下去,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改造自然,以创造满足人们吃、穿、用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无法生存下去,其他活动就无从谈起。毛泽东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就说明,人们结成生产关系,在阶级

社会中结成阶级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进行生产斗争、解决“物质生活问题”而服务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从事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论证了“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同时明确提出了衡量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生产力标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他把社会实践过程概括为“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验过程”。1963年5月,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了一段话,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更明确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三项基本形式。

毛泽东不仅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还进一步阐明了实践的基本特点。在《实践论》中,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他说:“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社会的人必须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实践活动,又说实践“是一步又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就是说,实践不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79页。

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不是静止的、不是纯自然的活动，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特点。

在写《实践论》的第二年，即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论持久战》一文中，又阐明了实践的客观性和自觉能动性的特点。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① 这里讲的“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讲的是人的认识，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知”；“做或行动”就是人们的实践，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行”。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把实践即“行”，概括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就是指把主观的认识、思想等等在客观上表现和实现出来，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实践的主体（人）、对象、工具都是客观的，实践是认识 and 思想的客观表现和实现，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实现这种主观认识向着客观现实的转化，又必须发挥能动性，因而实践具有能动性。毛泽东对实践的这种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概念的科学、明确、简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

毛泽东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这就告诉我们，实践是人们积极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的活动，它不同于一般动物消极适应自然的本能活动。实践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地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不了解实践的能动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77页。

把认识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唯心主义则片面夸大并抽象发展了这种能动性,把它说成是可以决定物质世界的东西。因此,他们都不可能科学地把握实践的特点和本质。毛泽东关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的表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科学揭示了实践的特点和本质。

总之,实践的基本形式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客观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是实践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和其他有关著作中所阐明的关于实践概念的基本内容。

2.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列宁的这一原则性论断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展,并遵循这一原则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问题。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而不是看成行动的指南,轻视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经验,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经验主义者则不了解革命理论对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同样割裂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首先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具体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毛泽东首先从认识的来源上说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和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实践之所以是认识的来源，就在于只有通过实践，人们才能实际接触和改造客观事物，感知事物的现象，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

毛泽东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们通过生产活动，一方面逐渐认识了自然界的现象、性质和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人和人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人们“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其他实践形式，政治活动，阶级斗争、科学文化活动，也是认识的重要来源。毛泽东用生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当时的社会实践的缘故。总之，一切

知识、认识、才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批评教条主义者轻视和脱离实践，凭着一知半解的书本知识，便自封为“天下第一”，是“世界上最可笑的”。

教条主义者一切从本本出发，迷信书本，实际上是把作为间接经验的书本知识当成了认识的来源。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直接经验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是不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而是一切古代的、外域的、别人实践获得的知识。毛泽东对二者的关系的论述是全面的、辩证的，他说：“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他一方面指出，学习间接经验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直接经验有局限性，“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间接经验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是“可靠的”；人们的认识正是在不断学习和继续间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他提出，间接经验也有“不可靠的”；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这就是说，别人的书本知识，归根到底也是来自实践，是“流”而不是“源”。而且，间接经验也必须通过自身的实践才能理解它和检验它。战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别人或过去的战争经验，理由是：“过去流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① 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2页。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还从认识的发展方面说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不仅从实践中发生,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从事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实践不断提出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新的需要、新的任务;同时,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也必然接触到客观世界更多的方面,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指出由于客观过程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这就推动了认识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人们认识不仅随着生产斗争的发展,而且随着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而发展。比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限制,只限于片面的理解,到了19世纪40年代,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日益社会化,由于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发展,也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当时的“科学实验”即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他们根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才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也是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和推动,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①

第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毛泽东还从认识的检验标准方面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外界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是否真理,必须通过实践去证实,实践检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外界及其规律的根本途径。实践之所以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由于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决定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②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引述列宁这一思想,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理论是“主观的东西”,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主观反映,它本身不能直接改造现实物质世界,即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因此,判定一种认识是否真理,是否符合客观外界及其规律性,在主观认识范围以内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离开人的活动而独立的外在客观世界本身也不具有把主观认识同客观现实加以对照的“本领”,它也不能回答某种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而实践则不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它能直接接触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把主观的认识、理论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的特点,因而能通过实践的客观结果把主观认识和外界客观事物加以对照,看它是否符合外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以及符合的程度。如果按照某种认识、理论去实践,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结果,这就证明,这种认识、理论是符合外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真理;否则,它就是错误的认识 and 理论。

毛泽东指出,许多自然科学被称为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为真理,就在于它们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思想,不仅总结了人类认识史,而且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都自认为他们的理论、路线是正确的,是“真理”,王明更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按照他们的理论和路线去指导革命,却到处碰壁,使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与此相反,按照毛泽东思想去指导革命实践之时,中国革命就不断取得胜利。无数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考验的时间”。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中,“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毛泽

东的这些论述,发展了《实践论》中的思想,阐明了实践标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历史局限性,实践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毛泽东说“常常需要考验的时间”,即往往需要检验多次才能证实某种认识或思想的真理性,因此,要对实践的结果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行认真的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在某一次实践中失败了,就判定某种认识或思想是错误的,这就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但是,只要是正确的认识或思想,“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就是说,认识或思想的真理性,最终即归根到底还要由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 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一语,再次强调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最终标准,这就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第四,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还从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方面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理论既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和推动而产生的发展的,它产生之后必然反转来为实践服务,必然以实践为目的和归宿;认识、理论要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必须依赖于实践。所以,毛泽东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不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又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40页。

② 同上,第890页。

践活动服务的,由此提出了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总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检验标准和最终目的。因此,毛泽东总结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和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做这样系统、全面、集中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今天对我们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和扩大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面对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许多新的试验和新的对策,需要大胆的开拓创新。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些讲话,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和强调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是促进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南。

(二)认识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识中国国情,并以这种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这是一个认识和实践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的正确与否,是否掌握认识发展的规律,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不能科学理

解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规律,造成了革命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对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列宁曾经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①又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具体论述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分析了认识的辩证过程,阐明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曲折发展的过程。

1.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人的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他指出,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它是人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和印象”,是对“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比如,人们到延安参观,开始时只是看到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人,参加一些会议,听到各种说话,等等,这些都是延安的外部的、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的感觉器官,产生各种感觉在脑子中留下印象,是他们直接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具体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就是感性认识。可见,感性认识是以事物的外部现象为内容。具有直接性、具体性、表面性、片面性等特点。感觉、印象等就是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

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② 同上,第181页。

了多次,经过大脑的思考,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发生了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然后由概念构成判断,由判断进行推理,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就是理性认识。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就是对“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的第二阶段,高级阶段,它是大脑对感性认识进行“整理和改造”而产生的,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的认识。比如,人们参观了延安,了解到各种感性材料,经过大脑“想了一想”,即经过思维的加工和改造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可见,理性认识是以事物的内在本质为内容具有间接性、全面性、深刻性、抽象概括性等特点。概念、判断、推理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

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群体如阶级、政党来说,都是如此。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开始是只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片面和外部联系,属于感性认识,无产阶级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处于“自发斗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就上升到理性认识了,无产阶级就成为“自为的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即自觉的斗争时期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争领导者对战争及其规律的认识、人们对工作及其规律的认识,等等,都是从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毛泽东把什么是感性认识,什么是理性认识,它们的特点是什么,都分析得十分清楚明白。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

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因此,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这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

其次,毛泽东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是从两方面说明二者关系的。

一方面,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因为,第一,“从认识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通过现象来表现,人们必须首先认识事物的外部现象,形成感性认识,然后才能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产生理性认识。高级阶段是从低级阶段发展而来,先有低级阶段,然后才能发展为高级阶段。理性认识只能“来源于”感性认识,“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毛泽东早就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调查情况”就是形成感性认识,总是在“先”的;“结论”就是产生理性认识,是在“末尾”即感性认识之后才产生的,这是认识的秩序。第二,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也是同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原理一致的。毛泽东说:“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外界得到感觉经验。”没有实践提供的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是不可能产生理性认识的。因此,毛泽东说:“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因为,第一,感性认识有局限性。毛泽东说:“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9页。

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片面性、表面性就是感性认识的局限性。毛泽东进一步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性才解决本质问题”。这说明，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深刻、更全面。所以，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和整体，“造成概念和理想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第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还是由认识的任务决定的。毛泽东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过程和那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正确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辩证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总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性质不同”，“但又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概括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在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同时，毛泽东揭露、批判了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以及实际工作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哲学史上长期有所谓“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唯理论有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唯心主义唯理论如17世纪法国的笛卡尔等人，不仅否认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而且否认理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们认为，人的认识是生而有之的“天赋观念”，感觉是会骗人的，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可靠的。唯物主义唯理论如17世纪荷兰的

斯宾诺莎等人，他们承认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但却认为感性认识是混乱不清的，甚至是造成错误的原因，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认识才是清楚明白的。“经验论”也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唯心主义经验论如 17 世纪英国的贝克莱等人，不仅否认理性认识，而且否认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荒谬性十分明显。唯物主义经验论如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法国的洛克等人，承认感性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但认为感性认识是唯一可靠的，理性认识则是靠不住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指出：唯理论的错误在于“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因为它否认了理性来源于感性；而经验论的错误在于只承认“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不知道”感性认识“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毛泽东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是十分深刻和中肯的，他不仅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且指出，唯物主义唯理论和经验论，就他们分别看到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重要性而言，“各有片面的真理”，因而加以肯定，但又指出，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是片面的，他们或者片面强调理性认识而否认感性认识，或者片面强调感性认识而否认理性认识，各走一个极端，他们都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同样违背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教条主义者片面夸大作为理性认识的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犯了类似唯理论的错误。毛泽东讥称他们是“知识里手”，批评他们否认了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是“世上最可笑的”。经验主义者则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把局部经

验当成普遍真理,局限于自己的狭隘经验,犯了类似经验论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己之见。”他们都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只有理性的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经验,或者只有感性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都是“片面性的”和“不完全的”知识,他再次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号召“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①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办法,正是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为基础的;毛泽东这里讲的“不同的两极”,就是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分别从两个错误的极端割裂了理论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既从理论上深化了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再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还告诉我们如何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毛泽东的论述可知,实现这一飞跃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掌握大量的、可靠的感性材料。毛泽东指出:“只有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8—819页。

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这是因为,客观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极为复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隐藏于大量现象之中,而现象又“五光十色”,有真象和假象,有些时候使人产生错觉,因此,搜集的感性材料必须是十分丰富和真实可靠的,才能在此基础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零碎不全和不可靠的感性材料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列宁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又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②为了保证感性材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毛泽东一向倡导深入实践、深入群众,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第二,要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的逻辑加工。毛泽东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和概括的对感性材料“改造制作”的16字基本方法。所谓“去粗取精”,就是去掉非本质的、次要的材料,选择能反映本质的典型材料;“去伪存真”,就是剥掉虚假的东西,去掉假象和错觉,把握事物的真象;“由此及彼”,就是不要孤立地研究材料,而是把各种材料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由表及里”,就是透过事物的表面外部现象,揭示事物的内部本质和规律。为此,毛泽东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经常教导我们要“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只有如此，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一个能动的飞跃。

2.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的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

首先，毛泽东阐明了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1963年5月，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为什么第二次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是为实践服务的，实现第一个飞跃的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第二个飞跃，只有实现第二个飞跃，才能把主观的认识、理论转化为客观的现实，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又指出，认识、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他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实现第二个飞跃，才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把主观的认识、理论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

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把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人称为“古董鉴赏家”,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就是如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从认识、理论的检验和发展方面来说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一种理论,在它刚创立的时候,只能是一种假说,其真理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人类认识史证明,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补充,克服其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检验,纠正其错误。因此,为了检验和发展认识、理论,理性认识也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毛泽东说:“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其次,毛泽东在分析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时,全面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认识依赖于实践,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实践的重大指导作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斯大林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② 毛

① 《列宁选集》第11卷,第241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泽东在《实践论》中先后引证上述列宁和斯大林的话，目的在于说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是理论的要求，又是实践的要求，理论要求指导和服务于实践，而实践又要求理论的指导和理论为它服务；如果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辩证关系，理论就成了“空洞的理论”，成为僵死的教条，而实践也就成为“盲目的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论述，为我们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哲学根据。

在稍后撰写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中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理论“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他认为，只承认“实践是主要的”，否认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转化的原理运用于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出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3.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到此，认识运动是否完成了呢？毛泽东说：“完成了，又没有完成。”他指出，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个不断反复和无限曲折发展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指明，经过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人们对某一个“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完成了”，而这一正确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才完成的。

他说：“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说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户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等等，就标志着这一认识“完成了”。

毛泽东指出，即是对这一“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也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中实现的，并揭示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说：“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序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

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此作了更明确的概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其次,毛泽东阐明了人类认识运动无限曲折发展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经过两次飞跃,多次反复,达到了预想的结果,“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这是因为,整个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其运动、变化、发展也是无限的,就一个具体事物而言,也有极为复杂的结构和层次。客观世界及其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认识运动的无限性。他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最后,毛泽东对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作了一个总括性的论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

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这一科学概括,说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认识运动不是直线发展或封闭的圆圈,好像是一条无限延续的螺旋曲线,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无限扩大和深化、无限曲折上升的规律和总趋势。

毛泽东还结合对认识运动的分析,提出和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深刻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认识活动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和克服上述矛盾,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的过程。然而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就是说,主观的认识、理论要同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的过程相符合;这种统一不是静止僵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就是说,主观的认识、理论要同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事物和实践相符合,同客观事物和实践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符合。客观事物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主观的认识、理论是对它们的反映,也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毛泽东说“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而前进”,“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任响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而“左”倾机会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

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总之,“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全党同志从哲学认识论上加深了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为我们鉴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鉴别一条路线是“左”还是右,提供了认识论上的科学根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还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原理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943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实践主要是群众的实践。“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将群众分散、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的过程,就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过程;不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无限

循环”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无限曲折上升的过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际运用,毛泽东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实践的新贡献和新发展。

(三)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发展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真理问题,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客观的,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坚持了真理的客观性,并着重说明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1. 真理是客观的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人的认识必须“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认为实践证实真理就是证实人的认识“合于外界的规律性”,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真理就是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真理是通过实践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中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它包含着不依人的认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他坚持检验真理的客观的实践标准,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正确,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1940年1月9日,他在陕甘宁

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强调“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就进一步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一切唯心主义者都认为真理是主观的，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毛泽东的科学论述，是对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深刻批判。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而且教导我们在实践中坚持真理、相信真理，跟着真理走，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批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装腔作势，害怕真理。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又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① 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2.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非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② 列宁说：“绝对真理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126页。

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毛泽东在这里深刻揭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在空间规模上无边无际，在时间发展上无始无终，都是无限的，因此是“绝对的”。而宇宙中的每一具体事物、具体过程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发展是有始有终的，因此是“相对的”。有限体现着无限，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无限的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由无数的有限的相对的具体过程构成的。

真理作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其内容是客观的，它和错误有原则界限，因而任何真理都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但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是对无限的绝对的宇宙发展过程中某一有限的、相对的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其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因此又都具有相对性，即有限性、不完全性。所以，毛泽东说：“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人类的认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

能力按其本性来说又是无限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每一客观真理的把握都是对无限的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的接近，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无数相对真理日益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所以，毛泽东说：“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毛泽东把绝对真理形象地比喻为一条“长河”，那末，相对真理就是这条“长河”中的“水滴”或“河段”。这说明，人们取得的任何一个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是绝对真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样，毛泽东就以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绝对性和具体过程的相对性为基础，揭示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关系，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论述要求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的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② 这就是说，它是客观真理，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因此必须坚持。另一方面，他又在《实践论》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就是说，它没有穷尽对世界的认识，又具有相对性，是相对真理，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发展。既坚持，又发展，这就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片面强调“坚持”而不发展，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相对真理，就会思想僵化，犯教条主义错误；如果以“发展”为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同上，第1470页。

口,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就会走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路。

3. 真理发展的规律

真理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由相对真理日益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 又是不断和错误斗争、克服错误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由于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发生错误的事是“常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达到真理。在稍后撰写的《矛盾论》中,他又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不仅指出了错误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和认识根源,而且阐明了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即真理和错误的斗争推动了认识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党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毛泽东一向倡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把这个问题同对人民负责联系起来,同党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1944年9月8日,他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真理是标志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客观事物及其

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错误则是主观与客观相背离,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反映,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明确指出:“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找出失败和错误的原因,就可以总结教训,发现和发展真理。1949年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建党28年的经验,得出结论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建国以后,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则明确概括和提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明确提出真理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发展。毛泽东正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真理发展规律的具体运用。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运用“真理标准”的观点,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由于认识等原因,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障碍和阻力。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问题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

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和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其精神实质和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只有深刻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才能认识和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从而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四）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革命地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①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历史使命。

首先，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说：要“整个儿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这里指的就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并改造整个旧世界，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这就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

其次，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改造客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页，第234页。

世界，就是改造自然和社会，其中包括“一切反对的人们”。毛泽东把“改造主观世界”理解为“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对“改造主观世界”的科学说明，因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归根到底在于使主观世界符合客观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又是为了使它满足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主体需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又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进行，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第三，毛泽东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要不断提高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性，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方向。

五、《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矛盾论》是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特别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引自《矛盾论》,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矛盾论》)。《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原是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讲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三章第一节,后来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于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它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矛盾学说的重要哲学著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成功地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把中国革命不断推向胜利;同时又在处理各种矛盾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鲜经验,上升到理论,创造出从内容到形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矛盾论》就是这样的著作。

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 毛泽东的《矛盾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出色地完成了“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系统论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指出，这涉及到“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一）两种宇宙观

列宁曾提出两种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②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提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1.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他说，“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论，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和场所变更，没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矛盾，而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用联系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仅有数量增减和场所变更，而且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转化”，而“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片面观点和全面观点的对立，都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表现，而这一切分歧和对立，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是否承认矛盾、承认对立统一引起的。这是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说：“究竟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①所谓联系，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联系。形而上学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懂得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世界；它用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看不到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用静止的观点去看世界，它根源于否认对立统一，由于否认矛盾即否认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只看到事物的量变，否认质变，“不能解释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所以毛泽东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对立统一”。^②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根本原因也在于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世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③可见，是否承认矛盾、是否承认对立统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焦点，这样，毛泽东就以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焦点上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47页。

②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96页。

2.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历史演变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还阐明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历史演变和阶级根源。他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对立的见解。

形而上学演变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很长时期内和唯心论相结合,比如,中国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既是唯心论,又是形而上学,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毛泽东说:形而上学“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形而上学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同唯物论相结合,比如 16 到 18 世纪欧洲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如英国的培根、洛克等,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但又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研究自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说:“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庸俗进化论的产生,所谓庸俗进化论,就是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质变,他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产生之后,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出现的,如英国斯宾塞等就主张这种观点。由于自然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公然否认事物发展成为不可能,所以形而上学便以庸俗进化论对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它是为日趋反动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辩证法的发展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自发朴素的辩证法。比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等,他们认为世界是在联系和运动、发展的,但由于科学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带有直观性、猜测性,所以毛泽东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辩证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论的辩证法，黑格尔对辩证法作了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他对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主张绝对观念派生世界，所以毛泽东说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又害怕革命的哲学反映。辩证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 19 世纪 4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在科学的基础上把唯物论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指出，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 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为了进一步分析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毛泽东还深刻论述了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他说，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量变，而不能说明事物的质变，“即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列举了大量实例，说明“自然界的改变，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改变，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毛泽东对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是全面的、科学的，他说：“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全面地、辩证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正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他一方面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

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影响“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他说战争的胜败“皆决于内因”,中国 1927 年大革命失败是大资产阶级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缘故,我们清算了机会主义,革命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路线上的巩固。”

毛泽东依据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方针,1945 年 1 月 10 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1958 年 6 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② 这一方针就是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4. 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目的

最后,毛泽东明确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目的,他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同时也告诉我们,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016 页。

② 转引自 1971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

盾分析方法即对立统一的方法,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这就进一步从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践意义上说明了它是辩证法的核心。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 矛盾的普遍性

毛泽东明确指出矛盾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矛盾无所不在,事事有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时时有矛盾。明确概括出矛盾普遍性原理的两方面含义,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新贡献。

毛泽东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大量论述说明了矛盾普遍性原理的第一方面含义。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 列宁说:对立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② 毛泽东则提出了“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著名论断。比如,在机械运动中,有作用和反作用的矛盾;物理运动中,有阳电和阴电的矛盾;化学运动中,有化合和分解的矛盾;生物运动中,有生和死的矛盾;社会生活中,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思维领域中,有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等等。这样,毛泽东就从物质运动的基本领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原理的第一方面含义，他概括地说：“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是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

接着，毛泽东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原理的第二方面含义。他是从批判一种错误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的。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只存在差异而无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毛泽东指出，这种观点必然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的根本原因，导致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按照这种观点，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而无矛盾，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内部工人、农民、资产阶级之间，只有差异而无矛盾。毛泽东说，这种观念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仅仅是还没有激化而已”，“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这就是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但矛盾表现为差异，差异是矛盾尚未展开和激化的一种形式。随着事物发展过程的推进，矛盾的激化和解决，旧过程结束了，新过程产生了，旧过程的内在矛盾就让位于新过程的内在矛盾，“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说：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不但在一系列讲话和论著中（如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的《新民主

主义论》等等)分析了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中国民主革命过程的复杂矛盾,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在许多讲话和论著中(比如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进一步把矛盾普遍性原理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①“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他认为,“十大关系,都是矛盾。”^③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④他批评“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的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9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75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744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767页。

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① 他还说：“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② 这就肯定了即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把矛盾普遍性原理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毛泽东还把矛盾普遍性原理转化为斗争策略和认识方法、领导方法。1940年12月25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他提出了对反共顽固派和帝国主义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③ 1942年2月8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④ 他告诉我们，提出问题就是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这就为我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指出了一个总的正确方向。他还倡导通过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工作方法，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⑤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他一再教导我们对事物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就是分析和揭露矛盾的方法。

2. 矛盾的特殊性

党内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不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54页。

的特殊性。因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了矛盾普遍性之后，特别强调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他说：“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应当着重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毛泽东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第一，“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毛泽东说，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社会现象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人们的思想现象，都有它各自的矛盾特殊性。

在分析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强调了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矛盾特殊性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不分析矛盾特殊性，就“无以辨别事物”，“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矛盾特殊性“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人的认识运动也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即特殊——一般——特殊，或个别——一般——个别，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从中“概括”出一般，认识事物的共同本质，再以这种共同的一般的认识为指导，进一步研究尚未研究过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具体事物，如此循环往复，使认识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这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即认识发展的规律。不研究矛盾特殊性，就不能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也不能使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见，认识矛盾特殊性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在这里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充分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懂得在认识了矛盾的普遍性即事物的共同本质之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

冒出来的具体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或“纯粹抽象的公式”,他们是“懒汉”,不懂得认识过程由特殊→一般→特殊的相互联结,“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高度统一起来,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又深刻批判了教条主义不重视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错误。

第二,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每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发展过程“都是不同质的”,各有矛盾的特殊性。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运动形式,就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不同过程,这些不同过程各有矛盾的特殊性。

在分析物质运动形式“不同质的”过程的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提出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等等。他批评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左”倾教条主义者就是如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们不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在政治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过程的质的区别,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说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主张“城市武装起义”、“阵地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对不同意

他们意见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完全背离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②要分别“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③进一步发展了《矛盾论》的思想。

第三，每一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但有许多矛盾各有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不但要了解矛盾总体的特殊性，还要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各方面去研究，才能了解矛盾的总体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比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必须研究每一种矛盾两方面的特点，才能把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本质。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提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因为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是不能揭示矛盾特殊性的。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毛泽东举了大量实例着重分析了片面性的错误，比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57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5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65 页。

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等等。他指出,片面地看问题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表面性就是对矛盾的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粗枝大叶只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不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如实反映它,所以片面性和表面性“是主观主义的”。他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总之,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必须反对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思想方法,坚持客观地、全面地和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第四,每一发展过程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和过程的本质,在此过程未完结之时是不会消灭的,但根本矛盾逐渐激化了,被根本矛盾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暂时或局部解决了或缓和了,又有些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示阶段性来”,在同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矛盾又各有其特殊性。比如,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中国民主革命可以区分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阶段。这些不同阶段,矛盾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说:“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第五,事物发展各个阶段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仅有其总体上的特殊性,而且矛盾的各个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开始阶段,国民党和共产党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建立到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个长达10余年的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双方各自的特点和历史变化,分析了两党矛盾发展的具体特点。

毛泽东通过对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的层层分析,形成了系统的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和学说,最后,他总结说:“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反复引述列宁这一思想。贯穿矛盾特殊性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具体分析“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的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和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研究事物和矛盾的“具体地位”、“具体形式”、“具体关系”、“具体条件”、“具体矛盾”以及解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决矛盾的“具体方法”，等等，反复强调“具体”二字，揭示了具体分析的各种复杂情形，这就把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和深化了。事物和矛盾都是具体的、发展的，只有坚持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地认识矛盾和正确解决矛盾，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富有生命力并蓬勃发展；离开具体分析，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抽象的僵死的公式和教条，因此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由于坚持对矛盾的具体分析，才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们是坚持具体分析的“很好的模范”。他批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3.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在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他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是矛盾的普遍性；但对于一般阶级社会而言，则转化为矛盾的特殊性。

其次，毛泽东指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他说：“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

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正如列宁所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① 比如,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是矛盾的特殊性,但却又包含和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共有的,是矛盾的普遍性;而这一矛盾的普遍性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特有的社会矛盾即矛盾的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

最后,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的共性,它是指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具有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个性,具有相对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论述是全面的、辩证的。他指出既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又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根据;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或根据。他号召我们要揭示和发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因为只有如此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事物和矛盾,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从而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矛盾学说,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不能科学认识 and 解决任何矛盾的。所以,毛泽东说: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论述,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辟的科学论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and 我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正是由于坚持了对立统一法则的普遍性,又分析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俄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才创立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因此,毛泽东称他们是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模范”。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原则正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其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普遍真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则具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中国革命的矛盾特殊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当成教条照抄照搬,经验主义者则把局部的狭隘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轻视或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也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还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①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5页。

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在新的阶段又出现了许多矛盾特殊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运用“矛盾特殊性”的观点加以认识 and 解决。具体地说,这种矛盾特殊性一方面表现在本地区或本单位同其它地区或其它单位的区别上,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在本地区或本单位的现阶段情况同过去阶段情况的区别上。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和实施适合各地区的不同的具体策略和具体模式,决不能千篇一律或强求一致。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一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毛泽东认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况都是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如果不研究这两种情况,对矛盾将陷入抽象的研究,找不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对这两种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就是在事物发展过程的许多矛盾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非主要矛盾即次要矛盾,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的矛盾。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如残存的封建势力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等等，都是次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比如，“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则转化为次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矛盾就暂时降为次要矛盾，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结成同盟、共同镇压人民大众之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为一端，人民大众为一端，构成为主要矛盾。

研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找不到主要矛盾，“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把握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科学阐明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而且正确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从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抓错了主要矛盾，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还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他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

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 要集中主要力量抓全局,抓重心,解决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在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因此,1949年3月,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又提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说:“弹钢琴要10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10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10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展开其他方面的工作。”^②

2. 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

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方面是矛盾两方面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非主要矛盾方面就是矛盾两方面中处于从属的和被支配地位的方面。

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说:“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和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在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发生了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依据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互相转化的原理,毛泽东提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他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2页。

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他认为:“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毛泽东从揭示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着手,分析新事物逐步由非主要矛盾方面转化为主要矛盾方面,旧事物则由主要矛盾方面逐步转化为非主要矛盾方面,他一方面指出了新事物成长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另一方面又深刻揭示了旧事物必然灭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新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毛泽东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互相转化,特别是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比如,在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处于支配地位,资产阶级处于附庸地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转化为附庸地位,资产阶级转化为支配地位,社会性质就由旧的封建主义社会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又由新的进步的阶级转化为旧的反动阶级,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被推翻,它由支配地位逐步归于消灭,而新的力量无产阶级则逐步壮大,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上升为支配地位,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转化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说,这是一切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毛泽东还特别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矛盾地位的转化。他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

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仅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互相转化原理的科学说明,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

毛泽东还把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运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提出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他说:“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楚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①毛泽东还经常教导全党同志,在执行党的路线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主要倾向影响显著,引人注目;非主要倾向不易觉察,往往被掩盖起来,必须警惕。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但总是有主有次,有反右防“左”,反“左”防右。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和善于抓主要矛盾。他反复阐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所谓“中心”,实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页。

上就是“主要矛盾”。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显然，邓小平始终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只有抓住和解决好了这一主要矛盾，才能进一步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指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毛泽东着重分析了矛盾同一性的两方面的含义。

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说的是矛盾双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比如，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无所谓生。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就无所谓上。其他如祸和福、顺利和困难、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总之，一切对立面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共处一个统一体中。

矛盾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说的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和地主、公有制和私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灭亡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等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实例,说明了矛盾同一性第二种含义的客观普遍性。有些转化,由于人们不易理解,因而怀疑矛盾转化的普遍性。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认为:“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毛泽东 1957 年 1 月 27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同政治的关系,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因此,“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关于生和死的互相转化,他说:“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互相转化,他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①毛泽东在阐述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时,强调矛盾同一性第二种含义比第一种含义,即对立面互相转化比对立面的互相依存更为重要。他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是因为,只有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才会有事物的质变,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才能真正的发展。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348 页。

会中落后、保守、反动的阶级、阶层或势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否认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只有现在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才否认对立面的转化,并用以迷惑人民群众,达到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目的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在于实现对立面的革命转化。毛泽东还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的思想用于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自身,他说:“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从而指明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可见,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突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是彻底革命的宇宙观,它突出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本质。

毛泽东还强调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客观性和条件性。他指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事物本来的辩证法”,矛盾都是现实的、具体的,不是主观幻想的,“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因此,对立面的互相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反复强调了条件的重要性,他说:“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是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

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① 事实证明了并且越来越证明毛泽东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确立后,由于各种原因,群众闹事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称之为“乱子”,如何正确对待“乱子”呢?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② 毛泽东关于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③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同一性两种含义的全面分析,是对列宁上述思想的科学说明和进一步发展。

2.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在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第一,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94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9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11 页。

的一样。”^①毛泽东具体阐明和发挥了列宁这一思想。

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同一性是暂时的，斗争性是贯穿过程始终的。毛泽东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这里说的“常住性”指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是同一性的表现，它是暂时的。“变动性”就是事物永恒不止的变化和发展，它是绝对的，由斗争性引起的，所以列宁说，“斗争性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泽东还进一步从事物运动状态阐明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即事物的量变状态和质变状态，而“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从毛泽东的论述可知，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根本原因在于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才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不受同一性所需的条件的限制，有矛盾就有斗争，而且矛盾斗争性还能打破特定条件的限制，不断创造新的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矛盾也只有通过斗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才能解决。所以说矛盾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

第二,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的。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对立面之间同时共存的两种基本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他引用中国古语“相反相成”说明对立面之间既存在斗争性,又存在同一性,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他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在统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总是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这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固然是相对的,斗争性固然是绝对的,但不能由此而片面夸大斗争性而否认同一性及其作用,或者片面夸大同一性而否认斗争性及其作用,两者是互相结合而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科学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出色地实际运用这一原理。割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在1924年至1927年间,我们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10年内战期间,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决裂的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66页。

候,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王明又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极端,跳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极端。毛泽东则一直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辩证观点,既善于在统一性中把握斗争性,从而反对右的片面性,又善于在斗争性中把握同一性,从而反对“左”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大量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比如1940年12月25日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又指出:“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② 他还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处理党内矛盾和其他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建国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总结:“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领导全党,用这个方法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和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7页。

党团结的目的,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①

(五)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毛泽东不仅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还进一步分析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 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

毛泽东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所谓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就是“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比如,自然界中炸弹爆炸、火山爆发、地震等等都是如此。社会生活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采取对抗的形式解决矛盾。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从而明确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性。矛盾斗争的非对抗形式是不通过外部冲突解决矛盾的现象,是矛盾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物种的进化,从猿到人的转化,社会生活中科学的革命,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等等,采取的都是矛盾斗争的非对抗形式。

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64页。

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2.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矛盾本身的性质。毛泽东说：矛盾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矛盾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大类。对抗性矛盾是矛盾双方的力量或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是此类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矛盾双方的力量或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形成的矛盾，如党内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就是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一般采取对抗的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一般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比如，共产党内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矛盾的性质变化了，矛盾斗争的形式，处理矛盾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

毛泽东指出，矛盾斗争的形式不仅取决于矛盾本身的性质，还受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的制约，他说：“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矛盾斗争的对抗

形式和非对抗形式,都是解决矛盾的飞跃形式即质变形式,采取何种飞跃形式,除了由矛盾性质决定以外,还受“条件”的影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是,“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①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对这个“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采取了非对抗性的斗争形式,就是由我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实践的结果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党妥善处理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顺利进行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理论上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矛盾论》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对《矛盾论》全书作了概括和总结。

第一,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在1965年的一个手稿中,又具体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8月版,第758—759页。

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①

第二,再次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他以精练的语言,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为中心,把全书连贯起来,揭示了《矛盾论》所阐明的矛盾学说各个部分和方面的内在联系。我们学习《矛盾论》,必须牢牢抓住贯串全书的这一中心线索,才能完整、深刻理解矛盾学说的理论内容。

第三,再次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指出:“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学习《矛盾论》,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一步深入批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847 页。

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系统论证和确立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特色之一，就是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进一步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首要方面，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经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经验。

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的确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一）通过整风对全党进行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教育的必要性

1. 主观主义是导致“左”右倾错误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党提出了奋斗纲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但是,在党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大多数同志,包括领导同志在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在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未能达到统一、完整的认识,致使党的工作出现了许多盲目性、片面性,最终导致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以及共产国际指示、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党内始终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本本出发,理论和实际相分离。

党的创立时期,陈独秀虽然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缺乏了解,只能是抱着“书生式的革命观”,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样板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对革命的领导权,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连续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尽管在表现形态和错误程度上不同,但都是在反右的口号下登台的:走“城市中心”道路,搞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视中间势力为“最危险的敌人、”;在战

略方针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形势,搞冒险主义,等等。特别是王明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90%,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组织几乎丧失殆尽,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

党的历史上出现的这些错误,在政治路线上有“左”右之分,表现形式也有不同,但就其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来说是共同的,都是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主义。究其思想根源,则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不符合。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主观主义者不能够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懂得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因而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唯心主义,陷入主观主义。王明教条主义者在对待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而机械照搬现成的理论,把相对真理夸大为绝对真理,从而使主观与客观相分裂,造成错误的认识及其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人,都没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主观主义指导分不开。自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在思想理论上否认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怀疑以致否定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创造性理论，因此，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总以不合乎苏联经验为由，视为“异端”加以否定。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十分严重，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达4年之久。

客观的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左”倾错误，比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右倾错误，出现的次数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欺骗性更大，从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更为严重。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的主要思想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能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真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反对主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从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年代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从理论的高度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主观主义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以及党内批评的主观武断，不要

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疑。“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

2. 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使中国革命从“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局中绝处逢生，并由此重新打开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的一页。

然而，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在当时只能在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否定“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因此，在许多干部中，对过去的错误还认识不清，未能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党内还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是伪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党八股。它们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搞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在组织生活上，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不正之风在党内兴风作浪，对党和革命事业起着严重的损害作用。王明本人也仍然坚持和推行其错误观点，1940年3月又再版了他的代表作《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续扩大“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由此可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面目出现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还没有为全党所识破，教条主义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教育党员干部，彻底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十分必要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大发展中增加了 70 余万新党员。这些党员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由于战争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局限，党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很不够，加之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接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错误思想作风的影响，为“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这些情况表明，王明教条主义统治之所以对党造成严重的危害和较长时间的影响，是同当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不高，认识能力不强密切相关的。要改变这种状况，肃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就需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很有必要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

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也同样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

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

1941年以后,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抗日战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局势相对稳定。这些,为能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创造了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了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整风运动也是毛泽东为解决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一个伟大创举。

整风运动是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的。整风中始终贯穿着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坚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坚持在实际工作中搞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系统地论述了整顿党的作风的理论,深刻阐明了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我们党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就要具备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武器好的条件。而我们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正之风,极大地妨碍了党的事业。因此,“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②

毛泽东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风,从思想方法上说,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坚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看,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还是脱离实际,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或根本不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从工作态度上说,是从事实工作,研究实际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还是好谈空洞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学风问题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是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树立正确的学风,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义的理论武装全体党员,提高全党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这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而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加以反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基本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①

鉴于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最大,危害最深,因而从根本问题上认识、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流毒,必然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主观唯心主义;一种是指主观地看问题的错误思想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作为哲学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唯心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体系,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形式宣扬“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思想。主观主义则是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倾向,是在处理各种现实问题时采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的一种从主观出发、忽视客观实际的思想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

主观主义是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为此,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本质、表现和危害进行了深刻、全面地批判。

首先,毛泽东系统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在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等方面的表现:在研究现状方面,对于国内国际的各个方面不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按照主观意愿办事;在研究历史方面,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的过去和今天;在研究理论方面,不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的这种“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① 的作风,对党的干部危害极大。

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剖析,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思想在认识论上都有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大理论的作用,轻视实践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只承认本本上的东西是真理,把本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根本上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的运用上,认为理论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公式,理论不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理论研究上,只热衷于空洞的“理论”研究,完全不注重理论的应用,只为理论而理论。教条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抽象地无目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①这种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革命遭受失败。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夸大个人感性经验的作用,使其脱离具体实际。经验主义者一方面轻视理论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满足于自己的狭隘经验,不能洞察客观事物的本质,通观事物的全过程,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必然陷入主观盲目性;另一方面,只承认个人一时一地的经验的可靠性,把个人的经验绝对化,去解决各个不同事物的矛盾,这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主观主义错误。

主观主义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是共同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分离为基本特征的,都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脱节,也就是不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来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党内的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②因此,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着重批判了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①

毛泽东还用通俗而精辟的语言，描绘了教条主义者的嘴脸。他说，陈独秀等人不懂得蒋介石手里拿着刀可以杀人；王明等人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深刻地说明了教条主义者闭着眼睛不顾现实，对周围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却硬要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片言只语，到处唬人，瞎指挥，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害革命。

为了彻底批判主观主义，揭穿党内教条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存在的糊涂观念，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②而那些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

为了彻底地肃清主观主义的流毒，毛泽东进而从认识论上对其进行了批判。在谈到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时，他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强调了认识源泉的客观性。他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814页。

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这是一条由客观经过实践到主观再到客观的思想路线。而教条主义者恰恰违背了这一认识过程,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①这说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遵循的是一条从主观到客观的错误的认识路线,违背了唯物论的反映论。

主观主义不但来自认识路线上的唯心主义,也来自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绝对化,是产生主观主义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发展了列宁关于认识的“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的思想,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毛泽东分析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在认识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是由于只有一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脱离了实际;经验主义者是由于有了一些经验和局部的感性知识但缺乏理论知识或普遍知识。二者都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从不同的两个极端将统一的两个认识过程形而上学地加以割裂,殊途同归,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克服这两种片面性:“有书本知识的人必须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

^① 《毛泽东选读》下第485、486页。

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①

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大敌。毛泽东对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能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论观点的问题乃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②

为了更好地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毛泽东还对主观主义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批判,指出宗派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③ 宗派主义也有两种,一种是对内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对外的宗派主义。对内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

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6页。

团结,造成党内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给党带来了危害。宗派主义的根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思想意识上则是个人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为要建立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树立正确的党风,也就是党在组织关系上的正确的作风。这种作风包括党内和党外两方面,在党内,要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外,要善于团结全国人民,使党成为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党。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①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一种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作风。因此,毛泽东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了对党八股这种不正之风的批判,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② 所以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③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④ 为此,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的文风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不仅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实质、表现和根源,而且系统地提出了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根本途径。他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①

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尊重唯物论就是要以认识的客观性来反对认识的主观性,一切工作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尊重辩证法就是要以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来反对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按照辩证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三条建议:一、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引出正确的结论。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先对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分别进行研究,然后作综合的研究。三、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必须用辩证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从事物的矛盾,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从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 只有对情况作周密地系统地调查研究,才能克服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工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调查研究是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桥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步骤。因此,毛泽东强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的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①

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强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学习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并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使广大干部党员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主观主义的危害,划清了正确与错误思想路线的界限,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论证和确立

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②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重要的,但要真正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使之为全党同志所掌握,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正是为这一目的而开展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3年,第242页。

实事求是整风运动中分清路线是非的锐利武器，它尖锐地提出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是承认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就是否认规律的客观性；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只能是主观盲动、以偏概全。从而使全党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清了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对立。

实事求是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赋予其科学的含义和理论形态。其主要标志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党的作风。

在整风运动的这三个基本文献中，毛泽东论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系统地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 把“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

在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是指一种切实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尚未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则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把它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文中首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在谈到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时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方向。”^①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科学的态度，作为反对“自以为是”的反科学的态度提出来。他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②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概括，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根本思想，是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哲学命题。

实事求是包含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

毛泽东把“实事”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这就以“实事”这一通俗的语言形式，概括和反映了人的意识之外的一切物质现象，把世界上客观存在着的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事物全部概括在“实事”这一哲学范畴中，揭示了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肯定了客观事物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第一性。实事求是要求从事实出发，从“实事”引出“是”来，即要求从客观事物中求得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这正是坚持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维的唯物主义路线。

实事求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

实事求是中的“求”，就是研究，就是去认识世界，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种研究，是人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原则,进行能动的反映,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求是”,就是去研究、找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性。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思想、认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同时也说明了物质世界是可知的。

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实事求是的“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就说明了客观事物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固有的必然联系,遵循着辩证法的发展规律而不断变化发展。毛泽东对“是”的概括,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人们通过实践和认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主体对于客观的辩证反映。

毛泽东用“实事”的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用“是”揭示事物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从“实事”中“求是”,科学地揭示了思维 and 存在、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概括,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实事”这一客观存在不是指一般的物质,而是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条件和环境等等;“求是”也不是一般的意识,而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样,毛泽东所概括的“实事求是”,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它是我们党几十年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主观和客观关系的问题,在哲学高度上的概括。

毛泽东在论述实事求是时,是把它作为主观主义的态度相对立的科学态度而提出来的,也就是作为与主观主义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观的事物和现象,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概括,正是体现了这么一种精神。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所以,毛泽东所阐述的“实事求是”,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全部经验的结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概括。

2.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毛泽东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思想,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的时候,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毛泽东以“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的对立为题,深刻地揭示了理论联系实际与理论脱离实际的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区别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态度的根本标志,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对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明确的说明。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在这里,毛泽东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并对其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质和要求,就是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毛泽东进而形象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关系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國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①

“有的放矢”形象而又恰当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关系，为全党指明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共产党人实现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对待和分析实际，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中揭示和把握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性。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根“箭”，就不可能选好、选准“靶”子。另一方面，也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才可能有效地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

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强调，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不是抽象的无目的的去研究，不是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要有的放矢，为革命实践的需要，为了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批评了那些所谓的理论家，指出：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并不能称之为理论家。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如果不能用马克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801页。

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家。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①

毛泽东提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 因此,重要的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词句和个别结论,而在于领会其精神实质,从中找到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革命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③ 也就是说,必须坚持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在阐述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的思想原则和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④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我们党的全部工作,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毛泽东还把能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论观点的问题，同共产党人的党性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现状和中外历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有的放矢，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②

为了更好地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几项基本措施：向全党提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实行调查研究，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有组织的分工合作的研究历史，首先是对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地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使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牢固地建立在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为我们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必须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马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思主义态度。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这是因为：第一，从客观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前提，做好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避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第二，只有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事物进行不断的调查研究，才能坚持客观辩证法，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第三，只有对具体的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才能避免生搬硬套，有的放矢。可以说，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贡献。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和调查研究理论的系统化。

调查研究活动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十分鲜明、突出的。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就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利用假期以游学的方式考察乡间的风土民情，了解农村社会状况。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通过实践和思考，努力探索中国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初步认识到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毛泽东便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社会调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基础上，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表现在系统总结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从事理论著述，积极倡导、组织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并通过整风运动，深刻批判了不作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从而提高党的干部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自觉性，使调查研究广泛运用到党的实际工作中去。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而且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发展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同坚持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提出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法。

首先，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获得正确认识的基础。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实际，才能从客观实际中获得正确的认识。否则，“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等主观主义的坏作风。而要了解实际，“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① 为此，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求全党的眼睛向着实际事物，对敌友我经济、政治、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②

其次，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曾经说过：“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际相联系。”^① 进行调查研究,先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的实际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加以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和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活动联系起来,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内在的规律性,对感性材料作出理性的概括。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调查研究,也就是强调了以唯物、辩证论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要尊重客观事实,保证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② 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事物的本质。

第三,调查研究是端正党风,防止主观主义的根本措施。毛泽东在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内容和方法的同时,还从树立党的优良作风的角度,在全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③ 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反对和防止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同制定和执行党的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联系起来,多方面地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查研究的理论。

在整风运动中，特别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了科学的阐述，从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总结，并通过整风运动，为全党所掌握。正如叶剑英所说：“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①

为了在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以后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在全党的解决，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为我们党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七、从世界观到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在哲学理论的研究和革命实践的活动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的思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方法，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纯理论的范围，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广大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时期，这既反映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的世界观上，也反映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的方法论上。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方法论的具体化，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完备而又严整的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体,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强调了哲学对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他批评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尚处在准备和酝酿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需要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旧哲学,创立完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而未能对方法论作系统的研究,以实现把哲学化为具体的方法论的任务。

列宁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列宁在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推进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方法论的进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普遍的方法。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他就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② 并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页;第39卷,第4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但是，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新康德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猖獗，因而，列宁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问题，而未建立完善的方法论体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历史任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革命发生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这种情况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其成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实际工作中问题的方法论。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异常的艰巨复杂。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中敌我关系的复杂性；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革命发展的前进与后退、高潮与低潮的反复性；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根据地斗争与白区斗争等革命斗争形式极其多样。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讲求科学的革命方法和斗争艺术。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的斗争中，重视研究和创造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这是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其独创的方法论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 毛泽东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思想，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完整的、科学

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说过，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件大事。所谓认识世界就是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到唯物辩证法这个唯一的科学思想方法中寻求方法。“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在这里，毛泽东直接了当地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称之为方法论。

毛泽东认为，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都能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一个总的方法原则。世界观不仅决定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观点，而且决定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去看世界，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

世界观决定着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表现为方法论，方法论体现着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也看作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关于“方法”一节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时也指出：“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思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思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①恩格斯在这里正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看作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论。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思想,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世界观,同时也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问题。这种思想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而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形式,是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应用。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提倡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

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包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属于认识方法,主要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求人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理论、决策和方法。世界观转变为方法论,首先是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才转化为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是世界观转化为具体方法的中介。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织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方法,它是在思想方法的指导之下完成各个领域和不同阶段规定的任务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方法论,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一致性说明了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它体现了世界观,反过来又影响世界观,对科学的世界观的确立和巩固起促进作用。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中创造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对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作了充分的阐述。他认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无产阶级政党所担负的革命任务,就在于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而对世界的改造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要提出改造的任务,而且要提出如何改造的方法。毛泽东曾就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和方法的关系问题时说过:目的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而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实践活动的成败,因此,他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方法论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对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人所担负的任务和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河与

桥或船的关系为比喻,作了深刻而通俗的说明:“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他还说,领导工作不仅要解决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果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而缺乏正确的工作方法,那么还会发生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完成革命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注重和提倡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直至延安时期达到了成熟,使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方法论更加完整而系统化。

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为了胜利地完成领导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毛泽东把领导方法、工作方法问题提高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号召全党的同志注意工作方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批评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联系起来,把工作方法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强调了解决领导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对完成革命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而“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还对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一种是表面上不怠工,实际都不能成功的命令主义。他认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为此,他提出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②

在批判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同时,毛泽东还对群众化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内容作了初步的论述,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要采取“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即“群众化的方式”也就是“实际的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是适合任务要求的,适合具体工作对象的,按照具体的环境、群众的具体情况去说服群众的工作方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批评了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40页。

工作方法,表扬了老革命根据地兴国县和赣东北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因为“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① 兴国等县的同志们所创造的这种“第一等的工作”,对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反“围剿”的胜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各地革命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相互影响。要解决这些矛盾,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认识工具,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之成为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对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阐述,使其系统化,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成功的运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农村调查〉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毛泽东把思想路线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其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议编辑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对全党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用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整风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过程,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具体应用。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时说:“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①

针对康生在审干运动中所采取的“逼、供、信”,扩大打击面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使“左”的错误得到纠正。

在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强调“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②毛泽东指出,只有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可能推动生产工作。这一时期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各项工作,都贯穿着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施,同时也为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是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化、 系统化达到成熟的标志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此文原题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集中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同时集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工作的长期经验,对党的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理论科学化、系统化的成熟标志。

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任务极其复杂,所管辖的地区广大而又分散,党的工作所涉及的部门和方面甚多。面对抗日战争的艰苦的斗争环境和复杂繁多的工作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讲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但是,这一时期党内的部分同志所采取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极大地妨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干部队伍不断扩大,许多新干部缺乏工作经验,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我们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学习和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纠正和克服不良的作风,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为基础的。这条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统

一。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党的领导工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他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毛泽东对这一领导方法的基本内容及形式与实施的全部过程作了具体的阐述,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从而把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精辟地概括为两种基本方法,即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②

1.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一马列主义的原理,是毛泽东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我们党要完成任何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没有领导的正确思想指导和组织工作,群众就不可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有了正确的领导思想,但不被群众所接受和理解,从而变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仍然解决不了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何问题。只有达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才能使党的工作得以开展,使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可以说,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因此,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统一、不可分割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历史观中群众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地揭示和解决了领导工作中的基本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关系,这是我们党领导工作最一般的矛盾,任何时候,任何有群众的地方,都存在这一矛盾关系,都需要加以解决。正因为领导和群众这一对矛盾具有普遍性,因此,毛泽东强调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使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普遍意义:“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并认为这是领导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①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包含二个意思。

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主要表现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实践活动的结合。路线、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为行动过程和归宿。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必须是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因而首先要集中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然后,将这一路线、方针和政策同群众见面,使群众认识和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900页。

握,并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党的任务的顺利完成。这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对这一领导方法,毛泽东作了具体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从群众中来”,首先要求党的领导者“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其次,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制定出正确的、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做到真正“从群众中来”,领导者必须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掌握足够的和真实的材料。由于群众中有先进、落后之分,认识问题的程度、深浅也各不相同,因此,群众中的意见也往往有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而且群众中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零碎的、偏于感性的。这就要求领导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已经取得材料(群众意见)进行分析,加以选择,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到群众中去”指的是:任何领导的意见都要到群众的实践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加以检验,“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让群众了解和掌握,使之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贯彻和执行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

“到群众中去”,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集中群众的意见,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指导群众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就要求领导者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拿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实践的检验,使领导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趋于正确。在指导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领导者要对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充分的了解,能够更好地付诸实施。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领导者离不开群众这一主体。领导者是群众中的一员。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离开了群众这一主体,领导者也就不存在;群众主体的实践活动为领导者的决策活动提供经验和材料,为领导者决策的执行提供保证和监督。另一方面,群众主体离不开领导者。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作的主持者,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只有在领导者的组织之下,群众主体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因此,毛泽东说,“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合”是我们党领导工作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对领导干部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作用给予肯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并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 正因为领导干部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一贯提倡和重视对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把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看成是我们党的战斗任务。

但领导干部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组织和领导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认识群众,这是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关系各异,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高低不等,所以,“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在这三部分人中间,毛泽东强调了积极分子的重要性。积极分子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在群众中起着骨干作用、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积极分子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领导者要善于在群众斗争中发现、选拔和培养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需要在群众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经受考验。因此,毛泽东提出:“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任何一个单位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领导者只有注意团结积极分子,并且形成以首要领导力量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骨干队伍,才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起群众,推动工作的开展。“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①

发现、选拔和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条件,但群众中除了少数积极分子外,还有大批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还有一部分处于落后状态的人。为此,毛泽东认为,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项工作,要完成任务,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要注意团结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而且要凭借这些骨干,通过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团结和联系广大群众,使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 毛泽东认为,只有把中间和落后的群众都动员和组织起来,才算完全地解决了联系群众的问题。他以整风运动为例,进一步说明了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1942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个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③ 毛泽东还对那些“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① 提出了批评,强调了克服这种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重要性。

毛泽东一贯强调领导工作中的方式、方法,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在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中,注意把原则性与说服教育的方法结合起来,不搞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对落后的群众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施予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党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落实。为了使党的领导干部掌握好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对阻碍这一方法实行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领导工作的命令主义、尾巴主义都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命令主义的做法,只能是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工作的失败。在领导工作中,命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左”的错误。而尾巴主义则是领导工作中的右的错误,“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因此,“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要贯彻和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就必须“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要求“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由于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工作的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毛泽东所提倡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和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提出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指出: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决不是由个人做决定。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相结合,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他还强调,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善于团结、依靠党委“一班人”,善于集中他们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观点、方法都体现了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党的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2.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指的是把一般的普遍号召和个别的具体指导结合起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关于认识个别和认识一般相联结的原理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生动运用和灵活体现。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论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过程。他指出: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是两个相互联结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总是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经过抽象概括,进一步认识一般的、普遍的事物,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之后,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去认识那些尚未研究过或尚未被深入研究过的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2页。

种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的认识。“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的深化。”^①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贯彻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的这一秩序,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既是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领导工作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他对这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②

领导机关,领导者为贯彻落实路线、方针、政策所发出的一般号召,是建立在对个别具体事物特殊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反映着同一类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是共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一般的号召能使党的领导机关、领导者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广大群众所认识和掌握,具有广泛动员群众行动起来,为实现一定任务而奋斗的普遍号召的效力。

然而,我们的领导工作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不能只限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使一般的号召得以落实,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因此,领导者还需要具体地深入实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突破一点,取得新的经验。这样,使领导者的一般号召受到群众实践的检验,并在其中得到充实和发展,形成新的指示去普遍指导群众。这就使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转化为群众的具体实践活动。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到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毛泽东一贯努力提倡和推广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就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②毛泽东强调,“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③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空洞无物的一般号召,毛泽东特别强调深入实际进行个别指导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因为没有个别指导,就不能检

①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8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验一般号召的正确性,也只能使一般号召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抽象的、空泛的口号。他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① 对于这种一般和个别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强调“必须纠正”。

毛泽东还强调,在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时必须注意分类指导。领导者在工作的进展和实施的方法上,要结合各地区、各单位的具体特点,在政策的具体规定上给予不同的指导,使之更切合实际情况。“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② 根据具体情况、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可以避免领导工作中的一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使个别指导真正落到实处。

根据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理,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剖麻雀”、“典型试验”、“以点带面”等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一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解剖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页。

雀之所以能够得到面的经验,这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解剖了个别事物,就能从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作出一般性的结论。深入研究一个典型,总结这一典型经验,对整个面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

毛泽东所总结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党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采取的两个基本方法,从这两个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中,我们党创造出了许多具体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一起被使用于同一过程之中,它们之间虽有区别,但都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以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在应用中又表现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两者之间是同一个过程。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地处理了领导和群众、实践和认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实际工作,创造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得到系统、全面地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再认识和抽象概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的领导一定“要胸中有数”要“学会弹钢琴”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出了《工作方

法六十条》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如“务虚和务实相结合”、“全局和局部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以及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这些科学的方法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并得到实践证实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结 束 语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是以 1937 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理论标志;以 1942 年党的整风运动和 1945 年党的“七大”为历史标志。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两论”抓住了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把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牢固基石和集中表现。“两论”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此后,毛泽东又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理论等等,既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论。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

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这些论著,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运用,并科学地制定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确立并为全党同志所掌握,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党的“七大”的召开。“七大”所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标志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达到成熟和系统化。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辟概括,实际上也是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本质内容的科学总结。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历史观在中国这一特殊条件和环境下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正如刘少奇在“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所作的概括: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

民完整的建国理论。”“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慎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①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它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4 年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富有成果的实践，以及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亦即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结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报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这也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惑，有待于我们去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学习和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必须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克服我们在思想认识上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3、335 页。

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主观性、片面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我们只有正确地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才能更加自觉地从本地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只有认识对立统一的规律,才能更加深刻地懂得为什么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又要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既要抓经济建设,又要抓民主法制;只有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都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不可能绝对孤立、完全封闭地自我存在,才能更加自觉地推进配套改革,更加重视基础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只有认识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每一次否定都是扬弃,克服前一发展阶段的消极的过时的东西,保留和发扬其积极的合理的东西,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总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可以有助于我们大大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90年代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仍是我们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宝库。